

六

伪满协和会

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图书馆

## 昙花一现的伪“满洲正义团”

乔 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在沈阳（当时称奉天）就有一个号称“大满洲正义团”的组织出笼。团本部设在小北城门里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汲金纯的宅院，同时还在其他地方遍设支部，广募团员，颁发证书、团章，并在小河沿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大量分发月饼，集体宣誓，一时锣鼓喧阗，声势浩大。影响所及，争办支部或充当团员者大有人在，简直把它奉为沦陷区里强而有力的一支保护伞。

这个团体的机构很简单，头头叫“盟主”，下设本部长、事务长、顾问、职员以及各地支部长。

盟主是日本人酒井荣藏，主持内外事务的事务长是小林德三，本部的职工大部分是日本的浪人（无业游民）和退役军人，他们一律身穿清一色的黑制服。利用中国人刘冠亚担当本部长，退闲的旧县长雷恒成当顾问，实际都是无所事事的牌位。

这个团体的性质，如同旧时代东北地方繁衍已久的“家理教”。但它的建团纲领则规定：“实现日满亲善，共同建设王道乐土，增进日满民众福祉（福利）”等等，充当侵略帮凶的角色。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派人四出讲演，宣扬日本的侵略行动是“仁政”，是“仗义相助，拯救满洲人民”。每遇什么节日，他们就搞些相应的活动；日伪当局有什么号召或措施，他们便积极响应，动员所属支部组织群氓摇旗呐喊；为了进一步拢络中国

人，他们还组织过自费的赴日旅游；他们在本部出版月刊一大张的内部报纸《正义时报》，报道本部和支部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另外还开设1所3个月期满的日语速成班，免费授课。由于社会影响愈来愈大，他们就渐渐衙门化了，有时还公然代管民讼，处理民间纠纷。

他们把中国人看做是蒙昧无知极其落后的愚民，企图任意摆布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在召开万人大会让团员集体宣誓的时候，竟然采用一种封建迷信的神道主义手段，杜撰出一个“正义之神”，强令群众拜祷，一齐呼喊：“祈予我以正义之力”的口号，用来麻痹愚弄参加大会的中国人。当然许多人是信这一套，只不过逢场作戏当个笑话看看而已。

究竟这个组织是什么来源，其真正的企图何在呢？说起来它并不是在东北地方新起炉灶，也不是仅仅甘愿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鹰犬的。原来在日本国内，早就有个小小的政治团体，叫做“日本正义团”，盟主也是这个酒井荣藏。这个团体，在日本政界只是一颗暗淡无光的小星，在议会上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他们所奉行的，不是什么先进的或开明的政治主张，而是明治维新后早已没落的武士道精神，鼓吹私人义气，闯荡江湖，所以把他们的头头称为“盟主”。酒井荣藏这个人，不过是在社会上胆大敢闯的所谓光棍儿，因此被尊为“侠客”，拜为首领。他们曾买动当时的三流作家村松梢风给酒井树碑立传，写成一部《现代侠客传》，译载在《正义时报》上，内容都是颂扬他怎样敢作敢为行侠尚义。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旧式的正人君子，倒也不无可取，但从他们来到东北的一切表现来看，却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在日本苦无出路，把“九·一八”事变看做是奇货可居，为了趁火打劫，便迫不及待带着弥漫的硝烟急急窜到东北来，企图先入为主抢占个发展地盘。他们假冒仗义行

仁，为日本军国主义奔走呼号，拉拢中国群众。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取宠于权门，捞些政治资本，得以鸡犬升天。早年东北地方的“家理教”，尽管属于封建落后的会道门，其宗旨只在于劝人孝亲敬长、戒烟戒酒、尊奉旧礼教，还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满洲正义团”与“家理教”，形式相近而实质有别。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时还有许多中国人招之即来肯于入团呢？对这个问题，需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那时候生活在沦陷区里，敌特肆虐，鬼域横行，闹得老百姓人人自危，魂梦难安，谁也不知哪一天会有飞灾降到头上。他们多数人是只看到“正义团”声势烜赫，不了解其来龙去脉，以为只要在自家大门上挂上个“大满洲正义团员之章”的长方牌，就象贴上一道灵符，可以驱鬼辟邪，最低也能取得个精神安慰，心里踏实一点。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信奉什么“正义之神”，祈求什么“正义之力”，不如说他们是迫不得已祈求一点保护颜色。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不应笼统认为他们都是甘心附敌卖身投靠。

承办“正义团”支部的分子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市井无赖，他们热衷于假借洋气唬人，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因此，发生的问题很多，“正义团”的日本人表面上也略加查问，实际并不深究，反倒有所纵容，认为这些走狗比较驯顺最听使唤，可以替他们四出钻营。

后来，“满洲国协和会”产生了，这是日伪当局官办的政团，表面上它是模仿议会组织伪装代表民意，实际则是日伪机关发号施令的传声筒，替敌伪政权宣布政令，传达号召。同时，他们一面伪造民意，组织老百姓积极响应表示拥护，以便于使其所有的侵略政策都能贯彻无阻。也就是说，它同伪政府的关系是表里一体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深入民间，一呼一应地演唱双簧。因之他们在组织形式上，也不能不网罗民间会员，也

同样要挂上个“协和会员之章”，这就不可避免地同“满洲正义团”唱起了对台戏。然而，在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方，不但可能象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假民主，容许若干政治团体自由建立，而且也不允许象日本那样有在朝在野的几种政团并存。他们既要利用政团作工具，又必须加以使之单一化，以免产生意外的不同政见。如此性质的“满洲国协和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对于民营的“正义团”就必须排斥。于是，在1936年间，几经折冲，终于使这个“满洲正义团”屈从引退，名义上叫做“发展的撤消”，并入“协和会”，酒井荣藏卷起铺盖退回日本，仅把小林德三留在沈阳转任“协和会”的事务长。至此，喧嚣5年的“满洲正义团”，只是昙花一现便告消失了。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 谈伪“满洲国协和会”

赵卜谦

### 一、伪“满洲国协和会”是个什么组织？

谈起伪“满洲国”就会联想起一个畸形的怪物——伪“满洲国协和会”（以下简称为“协和会”）。据称“协和会”与“政府”为“表里一体”、“形影相随”的伪“满洲国”的两根大支柱。在“建国”的时候，作为“国家机构”而结成的组织。具有“伪满洲国”独创的性格——“协和政治”的象征。与日帝的“大政翼赞会”和伪“华北政权”的伪“新民会”，在现实的运动方面虽具有许多的类似点，但是创立的精神却大不相同。伪

“协和会”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团体永久地护持“建国精神”，不断地训练国民，促成实现“建国理想”，是在思想上、教化上、政治上的唯一实践组织体。因而伪“协和会”既不是“政府”的从属机关，也不是“政府”的对立机关，而是“政府”精神的母体。伪“协和会”的存在又不等于资产阶级所谓“一国一党”的存在。伪“协和会”不是根据政党存在的愿望而产生，相反地却是避忌政党存在而产生的。

## 二、“协和会”在伪“满洲国”出现前的历史前身

在一般的常识认识上是有了伪“满洲国”才有了伪“协和会”的出现，而实际上却是先有了伪“协和会”的精神，而后才产生了伪“满洲国”。从1927年到1931年之间，在东北发生的中日问题：“溪湖石灰山事件”、“神原农场事件”、“大石桥滑石山事件”、“万宝山事件”均未获得解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作为伪“协和会”的历史前身，日帝的侵略先锋——满铁“青年联盟”和“雄峰会”开始与关东军作密切的联系和积极的活动，阴谋实现“满蒙独立”的企图。

“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的由来：1928年5月，“大连新闻社”认为日侨应有公共舆论机关的必要，采取反排日的对策，曾组织“满洲青年议会”。通过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对于“中日问题”、“中日关系”展开了热烈辩论。但是辩论的结果，因模拟议会制度发生了党派对立的问题，所以，同年11月将“满洲青年议会”改为“满洲青年联盟”。总部设在大连，并于金州、熊岳、辽阳、奉天、抚顺、长春、安东、哈尔滨、吉林等处设支部。拥有盟员5000余名，其中满铁社员占1/2以上，并发宣言：“经营满蒙遂行国策……”这就是“青年联盟”发生和发展的简单过程。

“雄峰会”是满铁社员，在形式上自由集会，表面上不同于青年社会运动有组织的“青年联盟”，而在实际上这50余名会员都是阴鸷之徒，张口“满蒙独立”，闭口“大陆经纶”，简练揣摩，钻研对策，与“青年联盟”殊无二致。这是“雄峰会”的概貌。

“青年联盟”的骨干有金井章次、山口重次、冈田猛马、小川博雄、大羽时男、中西敏亮、小山贞知、是安正立、原口纯光、关利重、藤井丹青、小日山直登、平岛敏夫、岩井勘六等。“雄峰会”的骨干有笠木良明、松木侠、八木沼丈夫、结城清太郎、牧野克己、中村宁、古贺董等。后来他们都是满铁的高级领导和伪“满洲国”、伪“协和会”以及国策会社（公司）的重要脚色。这些人都与日帝法西斯的“右翼团体”和“右翼教化团体”有关。其中还有“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正义团”、“建国会”、“国本社”、“神武会”、“立宪卷正会”、“国粹大政党”、“大亚细亚主义”、“全国立宪青年同志会”、“黑龙会”、“中央B木会”、“中央教化团体联合会”等组织的会员、党员、社员和盟员。因此，“九·一八”事变前，所谓“中村事件”的紧张时候，“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游说队”前往东京及地方各府县，作巡回的“启蒙演说”，受到300万在乡军人和“右翼团体”的欢迎，并得到陆军内部小矶国昭、建川美次等人的支持。我在东京杂在人群中听到他们演讲已超出了保护侨民、维护权益内容，而深入“满蒙独立”、“民族协和”的领域中。在“九·一八”事变后，“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等在军事上与关东军协力组成义勇队。在政治上与土肥原贤二组成奉天临时市政机构。在维持“治安”上组成以汉奸袁金铠为名，以金井章次、中西敏亮等为主的“奉天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他们对于“独立”、“大同”、“兴亚”总感觉缺乏一元的指导，又



另组成以汉奸于冲汉为首而实际以“雄峰会”会员结城清太郎为主的“自治指导部”，是指导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核心组织，旨在积极进行制造所谓“民族协和”的伪“满洲国”。

### 三、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筹备经过

由于关东军的威逼和“自治指导部”的宣传，于1932年2月16日到18日在奉天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产生了所谓新“国家”的过渡机关——“东北行政委员会”。并发表了“打破军阀政治，增进人民福利，机会均等，独立自主”的“宣言”。

2月29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所谓奠定“国家”基础的“政府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3月1日遂由该会发表“民族协和”王道国家的“建国宣言”。

伪“满洲国”未出现前的“自治指导部”，如果说它是制造傀儡国家的工厂，那么由该部后改的“资政局”就是涂粉刷浆的装饰店。在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团体“青年联盟”的盟员、“雄峰会”的会员的大部分都是“伪满政府”成员，担当“宣抚工作”和“启蒙运动”。以“指导员”、“参事”的名义随日军活跃于第一线。遂在长春创设“大同学院”培植伪满“新官吏”。

后鉴于“政府”方面与群众方面的关系应成为“浑然一体”，又认为“指导”的组织机关，有直接存在的必要，遂于1932年4月2日创设伪“满洲国协和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为日酋板垣征四郎、片仓衷和汉奸张燕卿、谢介石、于静远、阮振铎以及“青年联盟”盟员和田劲、小山贞知、山口重次等，经过3个月沿着所谓“建国精神”而草创“组织”大体就绪。

#### 四、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的宣言、纲领和工作方针

1932年7月25日在伪新京“国务院”举行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式”，并发表宣言。

同日发表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纲领”5条。“本会为唯一的、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体，与‘政府’表里为一体。（一）发扬建国精神。（二）实现民族协和。（三）使国民生活向上。（四）使宣德达情彻底。（五）完成国民总动员。以此5条，为实现建国的理想，建设道义的世界。”

#### 五、“协和会”创立时的组织情况

创立初，推溥仪为名誉总裁，推本庄繁为名誉顾问，推郑孝胥为会长，张燕卿为理事长，谢介石为中央事务局长。局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审查4个处，均为“青年联盟”、“雄峰会”等分子所占据。

除“中央本部”以外，设“首都本部”和“省本部”以及市、县本部。以下则按职业别、民族别、宗教别，组成的分会网，分布于各地方，形成基层活动组织。

随着伪“协和会”的发展，它的组织和任务也有不断的变更。大概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2年（伪大同元年）到1934年（伪康德元年），“政府”倾注全力于官治机构，所以，伪“协和会”从事治安工作和宣抚工作，即所谓教化的启蒙的运动时期。这个组织于1934年8月作了第一次的改组。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36年（伪康德3年），“协和会”的机构作了根本的改革，由启蒙的任务转到建设的任务。但在执行任务时，不断发生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又将组织作根

本的改革。

第三阶段，从1936年到1941年4月（伪康德8年），鉴于国际形势紧张，又转向备战时体制的组织，作动员工作、组织工作（积极展开会员的训练）。这时实施了备战时的机构改革。

第四阶段，从1941年到1943年（伪康德10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太平洋战争日趋激烈，伪“协和会”的任务从备战时体制进入战时体制，与“政府”确立“二位一体制”，实现一元的强力化，为发挥国民的总力体制，全力以赴。此时实行战时的机构大改革。

第五阶段，从1944年（伪康德11年）到1945年6月（伪康德12年），决定“战时工作要纲”以积极进行思想战为主体，因而在组织工作、运动方向上，都有较大的转变。这个时期“协和会”的机构须为适应于面临的任务，遂出现最后的一次改革。

## 六、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直属团体和外部关系团体

伪“满洲国协和会”的基本所属团体、即“首都本部”和省本部计划1处（内有兴安省的联络部3处）。市、旗、县本部计189处（内有10个筹备处）。分会计5000余处。会员达400余万。会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伪官吏、商人、宗教信仰徒等。此外还有直属团体和外部关系团体等。

### 直属团体

（一）“协和青少年团”。青年团员由16岁到19岁，少年团员由10岁到15岁的各民族的青少年男女所组成。使他们体会“建国精神”，并在国策线上的生活实践中，积极参与“勤劳奉仕”、“宣传宣化”、“治安肃正”、“情报搜集”等活动，完成所谓赋予的“翼赞”任务。1941年（伪康德8年），响应“勤劳奉仕”的号召，参加者达300万人。1944年（伪康德11年），响应

农、矿、土畜产品出荷的号召，参加者达900万人。1944年，青少年团的团数约达1万个，团员约200万名。从前“协和会”对于该团体进行管辖指导，后来在“首都”和省、市、县、旗各设“统监部”确立一体的系统指导。

(二)“协和义勇奉公队”，是由20岁到40岁身心健全的积极分子所组成。注重于“精神修养”和“行动训练”。具有“挺进队”的性格，从事于防空警护等活动，为国防中坚预备队。从1944年起，在“中央”、省各设总监部，在市、县、旗各设总队部，为系统的统制指导。

(三)“特殊职能组织”，1941年以后设“开拓部会”和“科学技术联合会”，也是“协和会”的直属团体。前者由指导开拓事业的职员所组成，后者由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所组成，以贯彻开拓政策，振兴农村和依靠科技的发明，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从此改变了以“地域分会”、“职场分会”为基础的平面组织，而为立体的纵贯的职能组织，以确立动员专门智能的体制。

#### 外部关系团体

(一)“满洲国防妇人会”。(二)“满洲军人后援会”。(三)“满洲国赤十字社”。(四)“满洲国红十字会”。(五)“满洲国道德会”。(六)其它宗教化团体、社会事业团体等。这些团体均与伪“协和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为促进该会的广泛发展效力。

#### 联合协议会

分为三级，即县(市、旗)联合协议会，省(首都)联合协议会和“全国”联合协议会。省联合协议会由县、市、旗联代表所组成。全国联合协议会由省联代表所组成。“全联”开会都在10月1日到9日之间，集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为一堂，准备提案，对于执行决议事项，不受法律的强制，而由协议员绝

对负责为道义的实践。

## 七、余谈

伪“协和会”这个怪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一言以蔽之，是日帝鲸吞东北四省136.05万平方公里和奴役3000万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一面以武装暴力来镇压人民，一面以“民族协和”来麻痹人民，玩弄两只侵略的魔手，妄图逞其并吞的野心。这幕丑剧是东方封建道德的“王道”腐朽论，中世纪的落后宗教思想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门罗主义的大杂烩。强调“大同”强调“协和”，是妄想混淆敌我界限，模糊敌我斗争，是妄想融敌于我，役我于敌而不生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有一种独特的妄想、欺骗的所谓传统的“理念”，即“八紘一宇”的“理念”。这个“理念”，从伪“满洲国协和会”创设的“理念”中，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夜郎自大”、不自量力的狂妄野心。

在伪“满洲国协和会创设的理念”第一项中，即揭示伪“满洲国”经纶的目标，是准备最后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争霸战，使苏联放弃对于亚洲东部的攻势。其野心不仅是为开发利用大陆的资源，而发展到纠合东亚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大业。所以，他们特别着眼为东亚各国家“亲善”为基础的民族团结。从这里可以看出日帝以“民族协和”这个得心应手的侵略工具，妄想推行到它所梦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实现所谓“八紘一宇理念”的第一步——东亚门罗主义。

其次，为着“满洲国”的生存，“协和”也是最有必要存在的东西。因为它能打破各民族亲善的障碍，吾人须以豁达的“协和”，来实现人类的理想。欲实现此理想须从“满洲国”来开端。因此东亚各民族的亲善，就是“世界统一”的第一步。这

正是过去传遍世界的“田中奏折”所说的“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即为统一世界的先驱”的同义语，为达成所谓“八紘一字理念”的第一步。

第三，它是决定国家根本国策的机构，拿“满洲国”说来，君主专制政治和议会专制政治都不适合。只有成立政治团体，获得各民族的支持，决定国家的根本国策，最为切合实际。满洲国协和会适应此目的而产生，并宣扬所谓胸怀大志的日本人都要踊跃参加“协和会”。从而形成的“满洲国”不是由日本政府支配的国家，而是由日本人参加“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理念”，就是“八紘一字”的“理念”，也就是日帝妄想称霸东亚进而统一世界的“理念”。不仅以“协和”幌子为侵略的工具，更进而重视“协和”为侵略的法宝。

## 伪满协和会的组织发展过程

谷次亨

协和会组织及其任务，大约经历了4个发展变化时期。几乎在伪满洲国成立同时，协和会也成立了，它的成立宣言是以“宣德达情，代表民意”为自己使命，与政府是表里一体的。在政治上，协和会是政府的母体，换言之，政府所行的政策，就是国内各民族所要求的意向。

满洲国协和会会长，规定是由国务总理兼任，关东军司令官规定任协和会顾问。

协和会组织，从中央到省（包括市）是分3个阶级。中央机

构在会长下设中央本部，本部下有总务部、指导部、训练部、宣传部。这些部的下边，还有许多科的组织。省的机构，有省本部、下边有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这些处下边，还有科的组织。市的机构，有市本部，它的下边有事务局长，该局长下边也有一些科的组织。该组织系省本部直辖的。县有协和会县本部，下设事务长，再下边有股长或班长的组织。

在第一个时期里，中央本部长是由大亲日家谢介石兼任的，当时他为伪政权第一任外交部长。省、市县的本部长都由民间酝酿、官方选定的所谓德高望众的人物。但中央本部长下面的总务、训练、宣传、指导各部长及这些部下的重要科长，均由日本人充任。省本部下面的总务处长、组织处长、宣传处长，以及这些处长下边的重要科长；市本部下边的事务局长及其下边的重要科长；县本部长下边的事务长及其下边的重要股长、班长等，也均由日系执掌。此外，不重要的处长或科长、股长、班长等由中国人担任。

每年春季前后，协和会省、市、县各本部，举行全省、全市或全县的联合协议会，会期三四天，出席会议的人，都由各级协和会所管区域选定的日、“满”、朝鲜人。开过这三种层次的会后，5月中旬，中央本部再召开全伪满联合协议会，一般开4至5天，出席会议的协议员由各省、市、县选定的，有350名至400名。主持这四种会议（中央、省、市、县协议会）的议长或副议长，都是临时聘请具有相当身份的人。在副议长司会之下，各协议员所谓代表人民向政府陈诉民情，并要求政府实现。给人以一种议会民主的假相，纯是虚张声势。而伪满政府对于这些协议员决不发表施政的新计划和新方针，而只是由各部派出几个中级官吏，听取他们的陈述，如有对既往所实行过的政策有不了解的地方，也由负责官吏略加说明。而对协议员所要

求的事项，如不与伪政府的基本方针相抵触，只限于局部范围的问题，有时也能兑现。

协和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到了1933年因关东军参谋长换了小矶国昭，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意见，申明要逐渐削减掉协和会所谓“宣德达情”代表民意的任务，准备采取用日本国内的“正义团”组织来取代协和会。日本国内组织的正义团，其活动中心是凡于日本人有利的事，就要做下去，不考虑其它民族利益，甚至不顾道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这个组织常使用暴力，它又名“国粹派”。小矶拟把正义团组织搬到伪满，是为了表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正义行为，不用顾虑国际影响，也不提倡民族协和，凡在伪满的各民族对日本一手建立的新国家，只有协力援助的义务，如有违反，即可处理。所以小矶到任不久，即在长春、奉天、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设置“大日本帝国正义团”，想逐渐在伪满普遍设置后，再命令协和会取消。为此，协和会的经费和人员逐渐减少，活动也逐渐消极，每年举行的全国协和联议会，也不过一两天，走走形式而已。由此，引起协和会系统的日系官吏的反对，故小矶的打算，在其任内没得实现，小矶走后，在各地设立的“正义团”也全部撤了。

协和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小矶被调走后，板垣接了参谋长，又重把协和会复兴起来。为欺骗世界人民，积极开展活动，并扩充了组织与事业，增加了人员与经费，还发展了一大批官吏出身的协和会会员，全伪满会员达到200余万人。同时，又使这些官吏兼任协和会各级组织的委员与协议员，使政府与协和会的工作又里表一致地协调起来。每年举行的全国联合协议会是相当隆重的，各协议员所提的民意要求，如不违反伪政府政策，也能被采用，当然都是些无关大局的具体小事。这时又把协和会所有的三级制组织，发展扩张到村，成立了村协和会支



部，有了四级组织了。

第四个时期，板垣走后东条英机接了参谋长，更进一步充实了协和会的活动内容。本来在第三个时期，协和会每年活动的经费不过六七百万元，一跃而为二千几百万元。这时又增加了办事的公吏和特殊会社的协和会员，发展会员约有300万人。并且在伪政府中央机构和地方各机关以及所谓特殊会社内，均设置了协和会分会。这些机关的副首长均兼任了协和会分会的分会会长，首长兼任顾问，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各分会委员。又使政府机关的重要首脑和官吏，都兼任了协和会的重要职务，同时又制定了协和会工作的五项纲领。

这个时期，日伪更大肆宣传协和会。

每年在5月中旬，在皇帝与关东军司令官亲临之下，隆重举行全国联合协议，会期长达五六天，尽力表现“宣德达情”的样子。

每年秋季，又隆重举行3天全国协和青年动员大会，最后在协和会长临场下，举行协和青年队的阅兵式。

在这两个会场上，都有外国记者和伪国通社报道，及驻在的各国外交官列席旁听或参观。协和会自身更大张旗鼓地拍电影，向各地放映，进行广泛地宣传。

也在这第四个时期伊始，中央本部长在日系人员下，添设了中国人副部长一人，是由伪政府大臣级兼任，同时各省、市、县的本部也增设中国人副部长。这表示协和会是与政府表里一体的形式。日寇这时如此起劲地宣传协和会，一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行为，利用协和会组织活动作为表演剧场，扭转世界人民的恶劣印象。二是欺骗人民，收买各级协议员，做忠实走狗。

总之，协和会这时完全成了伪政权的宣传辅助机关了。它

所制定的方针，完全合乎政府的奴役、压榨人民之口味。例如1942年伪政府要修建长春到哈尔滨的铁路复线，征不足劳工时，协和会动员青年分担了建设任务。再如伪政府强行征粮，要人民“出荷”时，协和会发起民众运动，不顾人民口粮多少，努力完成出荷粮数。

## 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的活动简况

于静远

1937年4月到1938年2月，我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兼中央本部委员，本部委员一直兼到1945年8月。

我到差后，立即扩充预算增到600余万元，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满省长、市长、县长兼伪满协和会的省、市、县本部长。我继续实施青年训练，成为积极培养推行伪满诸政策的骨干。

1937年夏，我参加吉林省联合协议会。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我以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名义出过布告，言词荒谬绝伦，压制了人民的抗日思想。1937年秋，我参加过三江省依兰县湖南营日本开拓团协和会成立仪式。

1938年，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组织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维持秩序，如传令、防空、防火、防谍等，还组织妇女参加。1938年夏，我参加过安东省联合协议会。同时，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访问意大利、德国经济使节团所着之协和礼装。

1939年，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

警察和地方行政实行“粮谷统制”及督促“粮谷出荷”。同年夏，协和会长张景惠招待意大利、德国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我出席作陪。

1940年夏，我参加协和会北安省县联合协议会。

1941年，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帮助政府推行伪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

1942年，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各地分会协助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储蓄政策，致使人民受到严重压榨。

我当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有8年之久，参加中央本部委员会议达200余次。

## 从一九四二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 看伪协和会耍弄的政治骗局

王子衡

伪满最大的、也是日寇最得意的、认为最有成效的政治骗局，要算是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了。因为它把所谓“建国精神的显扬”、“民族协和的体现”、“宣德达情的实现”、“国民生活的向上”、“国民动员的完成”等协和会运动纲领，也就是伪满政府的各种罪恶，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每年8月上旬在协和会馆的大礼堂举行的协和会全国中央联合协议会时，尽其宣传吹嘘铺张扬厉之能事，试举1942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的情况为例，即可知其全貌了。

## 伪满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临联合协议会

1942年8月3日午前7时，自伪宫内府到协和会馆约有两公里的沿途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喷水车来往洒水，两侧商店、住户闭门不出，军警步哨林立，交通断绝，行人敛迹，会馆内外满院遍铺黄色细砂，礼堂（会场）台上中央设一长方型桌子，铺上蓝花纹（伪满国徽）的红绒桌毡，桌后置一张浮雕蓝花纹的伪皇帝专用坐椅。午前8时，全国联合协议会协议员三百多名和伪政府各机关首脑、伪省、市、县各机关代表、各级协和会本部首脑以及驻伪满的各大公使馆，如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及罗马教皇、日本南京伪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政权之各大使或公使和馆员，以及日本“兴亚同盟”代表、南京“东亚联盟”代表、华北“新民会”代表、蒙疆“兴亚会”代表等二百多人依次入场，面向礼台坐着。8时20分扩音器报告“皇帝陛下已经驾离皇宫”，全场空气有些紧张起来，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协议员们，为得见皇上御颜而“激动不已”。同时伪政府大臣级和协和会部长级以上人员，都离席到大门外分左右两列恭立“候驾”。8时30分伪皇帝的车辆队已到协和会馆大门前，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向伪皇帝的车行以最敬礼，张景惠急忙到车前请伪皇帝下车，伪皇帝由伪侍从武官长吉兴陪伴下车，张景惠恭谦地在前引导，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尚书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伪大臣、部长等紧紧在后面扈从，在乐队响起伪国歌的吹奏声里缓缓进入协和会馆内设置的临时“便殿”（休息室）休息。略进香烟茶点，伪政府大臣级和协和会部长级以上人员一个一个地依次入室，前进一步行以90度的敬礼，再前进三步行以最敬礼，端立后退三步又行以90度敬礼退出室外。同时会场的扩音器又报告：“皇帝陛下现在便殿休息，马上就驾临会场

台上，请大家注意静听扩音器发出最敬礼的口令时，都要向台上皇帝陛下以最敬礼，不要交头接耳，左右窥视，低声细语，要绝对肃静避免失仪。”稍后，乐队奏起伪满国歌，伪皇帝步出休息室，在伪国务总理前导、伪宫内府大臣的扈从下，由会场左廊缓步前行，从容登台，站在礼台中央的桌后，音乐停止，全场人员向台上行最敬礼。伪皇帝端立不动，仅向外国来宾席微微点头表示回礼的意思。全场寂静几乎听不到呼吸的声音，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向伪皇帝呈以写好了的“教语”，伪皇帝的目光略向台下一闪就开口念道：“兹当我国国运隆昌百政兴举的时候，尔等聚首一堂协议国家大事，朕甚嘉悦，尔等应善体我国建国精神的实质，民族协和的真义，竭尽忠诚，妥为协议，促进我国各种事业日新月异，贡献亲邦（日本）皇军圣战早日完成，朕意所在有厚望焉……”

扩音机又发出最敬礼的声响，全场又向伪皇帝敬礼如仪。伪皇帝在伪国歌的音乐吹奏声中，缓步下台退出会场，径至门外登车离开协和会馆。伪政府首脑们仍到门外恭送，扩音机又发出“皇帝陛下驾离协和会馆”的声音，全场人才松了一口气，推出笑容，互相攀议起来。

扩音机又说“皇帝陛下平安回宫了，请大家注意，关东军司令官到场致训词时，请大家要按照扩音机的口令敬礼”。接着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带着他的参谋长等，在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前导下，通过会场的右廊前行登台，立于台上左侧的桌后，台下人们向他敬礼，他也向台下还以半礼。但在1934到1941年期间历年开会时，关东军司令官都是先于伪皇帝两分钟站在台上左侧的桌后，伪皇帝登台时，关东军司令官和其他来宾一样向伪皇帝鞠躬迎送。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这样表示，原为麻痹东北人民的精神，使人们认为伪皇帝实在是个真龙天子有

道明君，连关东军司令官都这样尊敬，一般老百姓焉能不服从。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傀儡，更好地统治东北，使人民屈服贴地甘作日本侵略者牛马般的奴隶。但是到1942年后，日本殖民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有失日本主子的尊严，因此改变为伪皇帝下台退场后，关东军司令官才登台，避免给伪皇帝敬礼。

1942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开始后，关东军司令官即宣读已准备好了的训词，大意是：

“今当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贵会召开盛大隆重的全国联合协议会，本司令官获得与诸位见面的机会，并且略述所怀，殊觉欣快。自大东亚圣战开始以来，日本皇军英勇善战节节胜利获得辉煌的战果实堪庆幸。但是这样旋转乾坤的伟大战争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结束的。因此，距离全面的最后的胜利还有相当的里程，在这期间日本上下一心军民一致，奋勇杀敌自不待言，只是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与否不仅攸关日本国运的兴废，也决定着整个亚洲各国命运的前途，尤其决定着满洲国存亡的问题，希望诸位本诸‘日满不可分携’的精神，会议讨论开诚相见，会议后回到地方（指地方协议员）更好地传达这种意旨，以竭尽全力援助皇军神使兴亚大业早日完成，共享幸福，这是我们共同希望、共同欢喜的事情……”

日军司令官读完训词后下台退场，伪政府首脑们的迎送，如同迎送皇帝的情况相同。接着所谓国外来宾如日本大使馆、汪伪政府、德国、意大利、罗马教皇的各大使或公使等致祝词和日本“兴亚同盟”、南京“东亚联盟”、华北“新民会”、蒙疆“兴亚会”代表等宣读祝词以及各方面的贺信贺电百余件摘要选读。会议第一幕到此完毕，占了整个午前的时间。

当天午后的日文中文各报都在第一版面用大字标题，把会

场内情况登载出来。说什么会议如何庄严、隆重、盛大，皇帝如何仁慈、诏示殷殷，关心民瘼，日满一体不可分离；关东军司令官如何郑重地希望满洲人协助皇军完成光荣的圣战任务；各国使节们致以恳切的祝词和贺信贺电等数百件，使参加会议者，尤其来自地方的协议员们，光荣地得到亲见皇帝陛下的尊容和关东军司令官的伟大面貌，并亲自听到垂训殷殷的“教语”，情意谆厚的“训示”，竟有感激涕零者等报道，以及协议员们的感想、伪政府首脑们的谈话和各种祝词照片累篇巨牍占了全版，尽其大吹大擂、感人听闻的能事。

同时，会场内设有密探、特务，监视人们的行动有无“失仪不敬”的表现。协和会某职员在伪皇帝休息室内多设一张椅子，被认为“冒渎尊严”而遭处罚；伪皇帝宣读“教语”时，有患感冒忍不住咳嗽出了声者，被认为“存心不敬”而受谴责。日寇妄图假藉对于伪皇帝必须绝对尊敬的虚伪形式，以实现对于日本天皇更须绝对崇敬的阴谋，从而养成人们绝对服从的思想，巩固其血腥的殖民统治。

### 伪全国联合协议会的组织活动

午后开始全联第二幕。协议员分为两种：一为代表伪政府有关机关的司局长级协议员四十多名；一为代表伪省、市（特别市）、县、市（普通市）各商学法团和社会宗教团体、伪国防妇人会，都市区长、农村村（乡）长等协议员二百多名。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没有一个工人、农民代表。会议设议长1名，副议长2名，书记长1名。产生的办法，由中央本部长提出候选人，经过全体协议员多数举手表决，表决结果是议长为中央本部长，副议长，一为伪政府的大臣级，一为地方协议中的法团代表（商学会会长），书记长为中央本部指导部长或总

务部长（1941年到1943年的书记长为王子衡）。议案分为两部分，一为协和会中央本部长的会务报告和伪政府国务总理以及各部伪大臣的政务报告。一为中央本部和伪政府提出的咨问事项及伪省、市、县、市联合协议会未能决议的事项。内容分为四类即：一为“建国精神的显扬”，二为“民族协和的实现”，三为“国民生活的向上”，四为“国民动员的完成”。

会场对面台上为伪国内外来宾和伪政府机关首脑座席，两侧和楼上，为伪政府机关职员、团体和学校师生的旁听席，全会场共有一千多人。

那日午后2时，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就议长席，指导部长王子衡就书记长席。三宅说：

“本会议是‘满洲国’最庄严的会议，本会场是个最庄严的会议，同时本会议也是个最尊重言论自由的会议，本会场也是个最尊重言论自由的会议会场，因此请协议员诸位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更不会受到意外影响，这一点由本议长负责保证，想各位能够相信的。那么，就先由协和会中央本部作会务报告后再请政府方面作报告。”

### 张景惠的奴才哲学——“要什么给什么，给什么要什么”

中央本部总务部长菅原达郎作协和会会务报告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登台作概括的政务报告大意如下：

“这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已如皇帝陛下（全场起立表示绝对尊敬然后坐下）的‘敕语’和梅津司令官所训示的那样，首先要认识到现在是什么时期，我国应负的是什么责任，举国上下应有怎样的高度觉悟，也就是要求大家要进一步体会建国精神的所在，民族协和的真义，尽到我们应尽的义务。会议上要披肝沥胆诚实发言，会后回到原地要充分



把会议的成就传达给人民，援助皇军完成圣战，对于衣食日用节约一点缩减一点。因此，国家要什么给什么，给什么要什么（指日本帝国主义抓劳工、抢粮食、夺财产，要痛痛快快地拿出来，同时，伪政府配给的橡子面、更生布等要痛痛快快地接受）。不要分斤论两计较多少，不要胡思乱想听信谣言，要听亲邦的话，听政府的话安分守职作一个善良的人民。共患难才能共安乐，这种精神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其他详细情况，武部长官和各部大臣将另有报告，请大家注意听，妥为讨论……”

### 武部叫嚷侵略战争高于一切

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报告大意是：

“‘大东亚圣战’开始以来已8个多月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日本皇军所向无敌，获得赫赫的战果，辉煌的胜利。美英侵略者在东亚百余年的邪恶势力即将扫除净尽，整个亚洲将恢复为亚洲人的亚洲，成为共存共荣的天地，但是谁都知道这样辉煌的胜利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我们皇军付出大量的鲜血，日本人民不惜任何牺牲所换取来的。我们日满两国既是一德一心生死与共的关系，正如张总理所说的必须先共患难，然后才能共享安乐。诸位要知道，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必须厉行人力、物质全部动员，才能很快地完成圣战，同时今日也是满洲国人建功立勋千载难遇的大好机会，圣战以来，满洲国上下人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虽然已有若干的贡献，但与日本人民付出的代价相比较，不免微乎其微，瞠乎其后者了。然而日本现在不是要求满洲国要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来，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要比过去做出进一步的贡献，这是满洲国无可推委的责任。因此，今年粮食的收购、劳力的供出、

财物的捐献要比往年踊跃一些。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不问可知，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大家紧紧裤带也就过去了，希望各位尤其地方协议员善体此意，回到地方妥为传达，竭尽一切支持圣战，各种具体事情各部大臣必有说明……”

### 伪大臣们强调粉身碎骨报效“亲邦”

伪军政部大臣邢士廉叫嚷什么要“注意不良分子造谣、生事、扰惑人心，加强伪国兵的质量，维持地方治安支援圣战”。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强调“多多供出劳工，建设国防军事工程，增产军需品，强化康生院，使鸦片瘾者变无用为有用的人，弥补劳力的不足”。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强调“为了支援圣战增设辅导院，使游手好闲、思想不良分子改邪归正报效亲邦”。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强调要“敬神崇祖报恩思源，宣扬建国精神养成勤劳习惯”。伪外交部大臣蔡运升强调什么“大东亚圣战皇军着着胜利，美英侵略者一败再败狼狽不堪，日德意三国枢轴坚如铁石，我们要以粉身碎骨的精神，既要打败白色（英美）的侵略，更要打退赤色（苏联）的威胁，这是我们天赋的使命”。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强调要“多多纳税尽量储蓄，踊跃捐献少买东西，节约煤电，以便发展工业产品支援圣战。”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强调“多多献出农产品、畜产品，尤其粮食的供出，要超额完成标准数量，保证军需民用和工业原料的供应，更要好好地与日本开拓民互相善处，亲如家人”。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强调“强化义勇护路团，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多修各种道路，使交通便利畅行无阻，加速军需民用物资的运送”。

至此时已午后7时多，三宅说：“第一日的会议日程到此为止，请协议员诸位把政府方面的指示和各地地方提出的议案充分

思考一下，明天午前8时继续开会，请各位踊跃发言就此散会”。

### 协议员叫苦连天，伪次长诡辩欺人

#### (1) 关于粮食问题

第二天午前8时继续开会，三宅把“供出粮食”议案提出来要求大家讨论。吉林省榆树县协议员安国治发言大意是：

“昨天听到武部长官和黄大臣的指示，说今年供出粮食数量比去年还多，这可是个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按今年现在情况来说恐怕有困难。今年雨水不调，秋收已无把握，本县土地不过20万垧（每垧10亩），每年产粮不过20万吨，去年供出的粮食是15万吨。但是本县人口有三十多万人，每年需要粮食至少为7.5万吨，仅就粮食一项就缺少2.5万吨，加上种子每年需要二千多吨，牲畜约有1.5万头，每年需要饲料五千多吨，三项共缺少粮食3.2万多吨，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也因饲料缺乏，肉类蛋类及皮毛的供出也将大量减少。正因为粮食、饲料两项的缺乏，人力、畜力也大为减弱，这也是今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今年粮食供出数量有增无减，对于农民的生活和来年农业生产问题的严重影响，将不堪设想了……”

很多的协议员纷纷举手争取发言，三宅指定伪滨江省（黑龙江省一部分和吉林省一部分改编为伪滨江省，省政府设在哈尔滨）双城县协议员于某（忘其名）发言大意是：

“本县也是本省产粮最多的县，去年供出粮食12万吨，但这是王县长用大马棒打出来的（双城县伪县长王奉璋为效忠日本主子在秋季抢粮时，经常手提马棒下乡催逼农民赶快出粮，挨过马棒的农民不计其数，即使村长等也不例外，因此人们称他为“王大马棒”）。今年如果再增加供出数量，恐怕再多几根马棒也是打不出粮食来的……”

黑龙江省林甸县协议员陈其有发言说，本县是个土质不好、产粮不多的穷县，去年供出的4万吨粮食是山菅（日本人，忘其名）副县长用火烧出来的。农民孙某（忘其名）因为食粮太缺，种籽饲料毫无着落，因此他在小草垛底藏了几斗粮食。在催粮官员们（伪县警察、职员和协和会职员等）沿门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时，来到孙老头家，看他的屋里屋外没有一粒粮食，催粮官员们气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你这老该死的杂种，把粮食弄到那里去了，快说！”，孙老头说现在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还会有藏着的粮食呢？催粮官们大怒起来，打了孙老头几个耳光子并踢上几脚，逼他快拿，老孙头还是说没有。有个催粮官突然发现小草垛有些可疑，便说草垛底下一定有粮食，他们一齐把小草垛推倒，果然发现1斗谷子、两斗玉米。这时山菅副县长也赶到，看到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点火给我烧，催粮官们便点起火来，小草垛登时化为灰烬并延烧了小草房。老孙头丧失了仅有的粮食、柴草和破房子，穷病交迫好不容易挨过了冬天，到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生活困难达于极点，其他农民如老孙头那样穷困还多的很呢，今年本省再增加供出数目，可真不得了……

三宅在陈其有发言当中，曾再三提醒说：“请简单些”；接着伪间岛省延吉县协议员池中龙（朝鲜族）发言大意是：“本县主要是水田地区，产的稻子历年全部供出，私留下来便是犯法，换来的是夹杂砂粒、草籽，不堪入口的小米，并且价格比出卖的稻价高出5倍多，农民生活穷困的情况要比榆树、双城、林甸各县还厉害的多。生产情绪无法提高，加上今年水源不足大大减产，今年供出数量不但不宜增加，还希望减轻一些，留点大米配给农民，在保证对国家继续供出上，都是有好处的……”

三宅说，先请政府方面作一解答。

伪兴农部次长的鬼话连篇。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发言大意是：“根据我们兴农部的生产调查，满洲国的土地每垧年产量1吨是指好坏地平均生产量来说的。象榆树县、双城县那样好的土地每垧年产量当在1吨半以上，也就是说榆树县20万垧地年产量可达30万吨。除去供出量15万吨外，尚余粮食15万吨。即使扣除食粮、种籽、饲料82000吨外还余6.8万吨，作为30万人口的生活消费可说是富裕得很。双城县的情况大致与榆树县相同。林甸县的产量虽然少些，但供出量也很少，政府只收买它们产量的1/3。并且从总的来说，政府每年收购量仅为全满产量1/3（这年伪满收购量为700万吨，以全东北全年产量2000万吨计算，当时伪满这个调查估计数字太不符合实际了）。农村还余有2/3的粮食，根本谈不到贫困饥寒的事情，若从每天火车到达新京（长春）奉天（沈阳）车站时，都有很多的大人小孩私带米面、鱼肉、蛋类等物品秘密贩卖的情况来看，更足以证明农村粮食物资并不缺乏，生活并不困难。至于双城县的王县长打人、骂人，一是人民不大听话惹出的结果，一是王的个人作风，政府方针并不是那样的。林甸县山督副县长的表现，也是一时激于气愤的结果，今后不会再发生那样事情。延吉县出产的稻子并没有完全供出，朝鲜农民经常吃大米，新京（长春）、吉林各城市的大米私买私卖的来源多半是间岛省生产的。并且朝鲜农民往往1天吃4顿饭，竟有夜间偷吃大米饭的，根本谈不到种稻子吃不到大米的话。政府供给朝鲜人民以小米是因为朝鲜农民素有吃小米的习惯，也因他们贪图暴利私卖大米买吃小米的关系，这种情况是谁都知道的。”

地方各协议员听了稻垣的鬼话，都认为强词夺理不符事实，有些激动纷纷举手欲争发言，但三宅说本议案内容很复杂，在本会议上一时不易讨论出结果来，我想把它交给分科委员会

(小委员会)讨论如何?大家无意见,夜间8时开小委员会进行讨论。

实际上在伪满时期,每垧地根本没有过一吨的产量,稻垣的话纯是欺人之谈。至于说来往火车私运粮食,多系地主富农所为,协议员也多为地富分子,他们发言表面似为贫农说话,实际是为他们自己利益说话。

## (2) 关于统制经济问题

第三日会议,三宅把关于统制经济议案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伪滨江省呼兰县协议员周言录发言是:

“从1937年政府发布开发产业法令以来,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同时并发表了‘七·二五’的物价停止令,尔后各种工业品尤其来自日本的工业品不断涨价,到现在已高出当日的价格数倍。但是满洲国出产的农产物的价格却是依据法令,丝毫没动,致使人民收入尤其农民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多,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生活困穷。试举粮食的价格来说,每吨粮食的生产费用在自然条件顺利的年月需要劳动力30个,每个工资3元即为90元,牲畜饲料至少需要10元,种籽5元,肥料10元,再加上各种税捐5元,共计120元。但是每吨粮食的卖价,政府规定1石细粮平均为100元,就是说每吨粮食亏损了20元;而棉布每尺10元,棉花每斤30元,还是有行无市,买不到手,即使偶有机会可买,又担了经济犯的罪名,受到重罚不算,还得坐监牢吃官司。至于灯烛火炭、油盐酱醋、生活日用品的费用,更无从出,如不及早提高粮价,不但农民无法生活、无法生产,政府又从何处收购粮食呢?”

奉天省(辽宁)协议员发言大意是:

“自从实行经济统制以来,日本人的大工厂、大会社(企业公司)日多一日,满洲人的小工厂、小企业日少一日。例如由

于实行钢铁的严格统制，仅奉天（沈阳）市满洲人的小铁工厂就倒闭了二十几家。农业工具的生产甚至如镰刀、锄板等小农具的生产都减到歇业的地步，买不到手；由于对棉花的严格统制，满洲人小规模织布工厂、针织厂也都歇业；由于对毛皮革类的严格统制，不仅满洲人的毛织业作坊、皮革业作坊早已不见，农民冬季用的防寒靴鞋也不见了。同时满洲人商家企业旧存的钢铁材料、五金废铁、各种机器和零件也都以贱价被收光了。相反的日本人大钢铁厂、机器制造厂、大纺纱厂、大皮革厂等等倒是日出无穷。因此希望政府把钢铁、棉花、皮毛等等原料稍微分点给满洲人的小工厂或手工业作坊，使它们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再说各种特殊会社，如满铁会社和政府各机关都各有消费组合（供销社），物美价廉，令人垂涎，但又只卖给职员官吏，一般人民得不到手。日本人经营的各种百货店，倒是各色货物俱全，但是有的东西只卖给日本人，不卖给满洲人，甚至门上干脆贴一个纸条，写着：“满洲人不许进来”。还有经济部阮大臣说叫人民多多储蓄，但是现在满洲人实际已无钱可储了。农民在交易场卖粮时，交易场付款处却代替银行强扣一部分作储蓄，这项存款不到一定日期，农民根本取不出来，等于白白丢掉一样。”

哈尔滨市协议员于开诚发言大意是：

“我们哈尔滨市素称北满的咽喉，物资吞吐、经济繁荣的都市。但是现在农产品既少集聚，工厂商业又多纷纷关闭大吉。但是官家又不许关闭，只得勉强支持天天亏本坐食山空，势必落到山穷水尽一无所有的境地。因此，希望放松经济统制，给满洲人工商业一线活路。”

各地协议员纷纷举手欲争发言。三宅说：“本议案先请政府方面作一解答，然后再行讨论吧。”

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实进行诡辩，他发言大意是：

“‘七·二五’物价停止令颁布以后，工业产品的价格虽然有些提高，这是由于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军需物资要求增加，劳动力缺乏，生产成本自然随之增涨起来，工业产品价格不得不提高一些。加上奸商不守法纪，投机囤聚，垄断居奇，满洲人商人尤为严重，致使物价飞涨，货币购买力因之减弱，这种扰乱市场、危害金融的行为，令人愤怒，希望诸位协助政府检举经济犯。至于农产物的生产费，决不会象协议员们说的那样高，并且除粮食外，还有其它土产、农产副产物和各种副业的收入为数不少，农民生活不至那样困难。棉布、棉花价格奇贵，那是由于私买私卖的关系。官家在购买粮食时，配给一定比例数量的棉布、棉花、线等日用品，价格很低，对于农民生活的补助当有很大的作用。这些情况想协议员诸位会比我更详细更明了的……”

实际所谓奸商垄断居奇，并不是所谓满洲商人而是日本的垄断资本家，青木本身就是经济犯的主脑者，人们如何检举得了。至于贫农佃户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给地主的租外，余者竟被狼虎般的催粮走狗们抢夺搜刮一空，根本没有余粮可卖。农民运到交易场的粮食多半是地主富农的东西，因此所谓配给的棉布、棉花等物品多被地主富农得去，转以高价卖给农民获得暴利，或者卖给奸商转卖给都市，获得更多的暴利。即使农民幸而有点粮食卖给交易所，得到的所谓配给物品也是寥寥无几，或者干脆被交易所的恶劣职员们借故刁难、欺骗讹诈去了。

协议员们还想说话，但三宅说，这议案复杂交给分科会讨论如何，大家无言，第三日会议到此完毕。

### (3) 关于食粮配给和劳工问题

第四日，三宅把食粮配给和劳工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伪



龙江省（黑龙江省）某协议员（忘其姓名）发言大意是：

“满洲地广人稀，劳动力从来缺乏，过去每年从华北方面进来劳工100万至200万人，补充各地劳力，农业生产还可以勉强支持下去。但从满洲实行经济统制以来，中国各地劳工入满大受限制，即使辗转来满而每年工资的收入又受到汇兑限制的影响，不能寄回家去，维持父母妻子的生活。因此，来满劳工逐年减少，现在大有绝迹的样子。另一方面每年从农村供出‘国兵’、‘勤奉队’、劳工队、协和义勇奉公队和爱路团等等人数不下200万人，致使农业进入日日减产直至无法生产的境地。而官家要粮要人的命令却如雪片般飞来，催粮抓人的官员接踵而至，这不是逼迫农民陷于死地吗？并且供出的劳工到了工厂矿山和其它地方（指日军的军事工程地带，因从来不许泄露，故发言者不敢明说）。口粮既少且恶，衣服不能蔽体，从事苛重的劳动，患病没有医药，因此饥寒交迫劳累而死的逐日增加，或者有些人干脆一去无影无踪（指为日寇修筑军事工事后被集体屠杀，防止泄露秘密），即使幸得归来多成病弱残废，无力劳动。”

听到这里，三宅两只凶恶的眼睛向全场一扫，更瞪视某协议员说，“发言要简单”。某协议员只好草草地结束了发言。

奉天市（沈阳市）协议员陈丰年说：

“我同意龙江省协议员的发言，我们奉天省是工业地区，着重于工业生产，而农产品多为经济作物，食粮殊感缺乏，配给数量极少。例如奉天、抚顺、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等市居民，每月粮食配给大人不过12斤，至多不过14斤，小孩仅为五六斤，区区此数不仅不够大人每月吃粮量的1/4，而10岁以上的小孩每天比大人还吃的多，仅仅五六斤怎样维持生活呢？”

三宅不耐烦地又说“协议员发言要简单”。该协议员接着说：“因此希望对于工业城市人口的食粮配给量应当增加一些，

工人吃不饱没有力量干活，生产不出东西来，军需品供给不上，岂不要影响圣战吗？”

新京市（长春市）协议员程子明说：

“我们吉林省号称谷仓地带出粮很多。但是新京市满洲人食粮的配给量大人不过11斤、小孩只5斤，还赶不上奉天市的配给数量。并且本省又是水稻产区，但是我们根本吃不到大米，而日本居民却天天吃又白又香的大米饭，并常常看到他们把带着白饭的锅巴随便抛弃。”

三宅又以凶恶的双眼瞪着程某说“简单！简单！”。

各地协议员纷纷要补充发言，三宅说，还是先请政府方面作个解答再说吧。

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进行诡辩。这位策划经济统制的谋士反驳说：

“龙江省协议员说满洲农村劳力不足，这话令人难以理解，据政府统计现在满洲的农村人口至少有3 000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至少有600万人，而满洲已耕的农地不过2 000万垧（每垧10亩），每个劳动力每年可耕种5垧地，那么2 000万垧地至多每年不过需要400万个劳动力；600万劳动力扣去400万个还余200万个劳动力。即使每年供出的国兵、劳工、勤奉队、协和义勇奉公队和爱路团等不过100多万人，还余100万个劳动力，怎样还能说到劳动力缺乏呢？况且满洲妇女从来不下地干活，如果动员起来至少可以增加100万乃至200万个劳动力。这样看来，满洲农村的劳动力还过剩得很多。请协议员诸位回到农村，协助政府动员一下，劳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至于说供出的劳工，有因饥寒交迫劳累而死的话，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政府对于矿山工厂的劳工的粮食配给都是特别加量的，平均每人每月40斤以上几乎超过我们日本人的口粮一

倍，衣服也是特别发给，怎能说到饥寒呢？每天8小时劳动怎能说到特别劳累呢？对于患病者比一般人都是优先供给医药，怎能说到医药缺乏呢？至于人的死亡那是人生的规律，试问，那些不到矿山工厂劳动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不是天天也有死亡的吗？

对于城市满洲人的食粮配给量比较少点，这是事实，但是由于满洲人比其他民族多为土著，人熟地熟绝大多数做着投机倒把秘密买卖的勾当，收入很多。试看每天各车站的满人男女老幼旅客，多从乡下私带一些大米、白面、鱼肉、鸡鸭等物供给城市的满洲居民，其他大宗的私买私卖更是不计其数，致使经济取缔者疲于奔命抓不胜抓。吉林省每年可产大米70多万吨，而政府只收购40万吨，其余30万吨多半由小道进入城市，秘密卖给满洲人，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因此满洲城市居民的食粮无需增量。

我们日本人来到满洲，人生疏地也生疏，说实在的话，日本人又比较诚实，一般的不会作私买私卖的勾当，因此配给粮食比较多些。至于配给粮食的种类是按各民族的习惯来决定的：满洲人从来吃高粱、苞米，所以就配给高粱、苞米；朝鲜人从来吃小米，就配给小米；日本人从来吃大米就配给大米，这是公平合理的办法，有什么奇怪的呢？满洲现有的水田面积很小，但是可变作水田的土地却很广，满洲人想吃大米，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只有努力多开水田，多种水稻，多产大米，既合乎政府的要求，也满足了满洲人的希望，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吗？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满洲人暂时忍耐一下……”

各地协议员虽然有些气愤欲争发言，三宅却宣布今日会议到此为止。

古海这些鬼话实是漫天大谎诡辩欺人。实际过去东北农业虽有粗放的习惯，但每个劳动力每年至多只能耕种3垧地，以东北2000万垧土地来说，每年至少需要600万个劳动力，加上所谓供出的劳工、伪国兵、勤奉队等等，至少抽出200万人，合计需要800万个劳动力。即以古海估计的600万劳动力来说也还缺乏200万劳动力，则农村的劳动力不足不辩自明，并且东北农村妇女从来就有下地劳动的习惯，还去动员谁呢？

至于所谓私贩粮食等物，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奸商和日本垄断资本家所为。因为在所谓收购粮食时，地主富农勾结伪警察、特务，先让贫农佃户把交完地租后仅有的余粮全部交出，不足的数量再以他们的粮食补充；余者则私藏居奇高价卖给贫农或者通过奸商卖给日寇垄断的粮栈。至于贫雇农中间有把自己仅有的粮食送到伪满兴农合作社交易场出卖时，交易场的走狗恶徒勾结日本人百般刁难农民，强索贿赂，若不如愿，即在验粮定级时压秤压等，明明100斤硬说是80斤或90斤，明明是一等好粮硬说是二三等粮或降为等外。农民如果不服与之争辩，不遭殴打便受辱骂甚至逐出场外，过了时间停市不买。农民离家五六十里或百八十里运粮回家，则时间已晚来不及了，万般无奈只得把粮运到栈房存寄，第二天再去出售，而收购粮食的恶徒们依然百般刁难，农民如仍不服，粮食仍然卖不出去，还得住店。住店一宿，人吃马喂耗费很多；即使幸而把粮卖妥，到付款处领款时又被强扣10%的储金，浪费几天工夫到手的粮款已所余无几了。地主富农又复逼还高利贷，结果贫农全家大小勤苦一年，两手空空，衣食全无。只好又复哀求地主、富农再借高利贷，以高于出卖交易场的粮价两三倍的价钱，买回一点食粮，暂时糊口。又往往被伪警察发现，竟以“经济犯”的罪名关押起来，遭受百般折磨，幸得出来后，已经贫病交迫，因

而惨死的时有所闻。地主富农把剥削榨取而来的粮食，以一半运到交易场贿赂走狗恶徒们，他们的粮食很快地就被验妥，验成一等好粮，出卖后并得到棉布、棉花、棉线等物品的特配，拿回农村以十几倍的高价，卖给农民；或者通过奸商卖给城市居民，获得暴利。地主富农又把私藏的一部分粮食屯积居奇，又以十数倍的高价卖给农民，或者通过奸商转到日寇垄断资本家手里，秘运华北华中方面获得暴利。地主富农的私粮还有一小部分落到小商小贩手里，转卖给城市。善良的贫苦农民，为了购买生产资料，或必需的日用品，和必需偿还的高利贷，不得已也间有从地主富农手里以高利买点粮食等物秘密拿到城市，以更高一点的价格卖出去，以济刳肉医创燃眉之急。不幸又被伪警察走狗们发现，把东西没收，还受打骂折磨。古海所说的每天各火车站和交通路口发现一些私带粮食等物品，它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 (4) 强收土地和日本侨民的横暴

第五日，三宅把伪政府收买土地问题和所谓日本开拓民的问题提出讨论。

吉林省五常县协议员谢某（忘其名）说：“政府收买土地供给日本开拓民耕种使用，我们满洲人当然赞成，无话可说的。但是现在收买的不是荒地、山地、河边地，而是农民耕种多年的肥活熟地，并且给的价钱很少，还不够现在地价的20%。有时收买甲地并把乙地丙地包套在内，只出一份地价却买两三份的土地，农民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一看，他那多年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却不翼而飞了。例如本县太平村葛其发的3垧地，就被包套了去，使得他家5口流离失所，听说他老婆和3个孩子，现在哈尔滨市太平桥下的贫民区里靠缝穷讨饭度日；老葛被抓去当劳工没有下落，死活还不知道。即使能够得到公开的买卖

而所得的地价还不到时价的1/5，又没有指定移居地点，只得流离失所辗转他乡，密山县谢文东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致使农民无心耕种影响生产，也就是影响对于圣战军需的供给。并且现在在日本开拓民来的有限，收买的土地无人耕种，多半荒芜，这又影响了粮食的增产。即使有开拓民的地方，由于日本人不会耕种旱田，多半转租给满洲农民。开拓民居然成了地主，什么也不干，并经常驱使满洲农民给他们干零活，任意抓拿农民的鸡鸭家禽杀而吃之，不给分文；虽或有自耕土地者，也任意使用满洲农民的畜力，既不给畜力报酬，也不给饲料，农民稍微同他计较一下，便遭受恶骂毒打，并有开枪威吓农民的。这类情况经常发生，希望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日满两国人才能平安相处……”

当时伪满各地凡有开拓民的，情况都是这样，各协议员纷纷举手争取补充发言。三宅说，还有许多议案需要讨论，为节省时间先请政府方面解答，有不足时再请协议员发言。因此伪满政府开拓总局长五十子崑用他惯用的粗暴语调发言说：

“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开拓移民，这是满洲国的三大国策，谁都知道的。这三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实行的好坏既关系到满洲国的兴亡问题，也关系到满洲人的死活问题。日本开拓民前来满洲国负有两种使命，就是既负担开发满洲产业的使命，又负担振兴北边的使命。由于满洲地广人稀，并有很多的河川可供发展水利，建设水田的需用，可是满洲农民只会种旱田不会种水田，更不会利用水力经营水产，大好富源弃之可惜。日本开拓民来到满洲后，把开发水田利用河川，经营水产、林业等技术传给满洲人，对于开发满洲产业来说，有很大的贡献。

再说满洲国北边的大门是大敞大开的，满洲人没有力量把

守这个大门，如果强盗（指苏联）一旦闯进来，满洲的国土不但寸土难保，整个的生命财产也是无法保全的；日本开拓民来到满洲，一面为满洲人开发产业繁荣经济提高生活，一面为满洲人准备付出生命把守大门，保护满洲人的土地财产和生命安全，满洲人应当感激，应当欢迎，为什么倒反抱怨愤恨，真令人难以理解。并且满洲土地很广，可作农田的约有4 500万垧，供给两亿人口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政府收买的土地不过满洲可耕地的1/10，对于满洲农民的生活毫无影响，并且所买的多半是半山半坡带有河川的土地，即使其中有点平地为数极少；日本人初来满洲马上开垦有些困难，先买点熟地耕种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收买的地价是遵照政府颁布的物价停止令的标准，因为土地价格当然在经济统制的范围之内。现在开拓用地当然闲着的不少，无地者如果愿租开拓用地耕种，政府倒很欢迎。假如能够这样做，数年之内他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富有者，因此不能说农民无地可耕从而失业的话；并且他们手里还有卖地钱款尽可另谋生活，不致穷困得没有生路。关于指定移居地点，政府自当从长考虑。至于包套土地的事情可能是在登记过册时手续上有些错误，政府将查明纠正……”

五十子岚拿出这一套，进行欺骗蒙蔽，狡猾诡辩的同时，更先提出了所谓三大国策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协议员感觉头痛不能动弹，一时默无一言。三宅便说本议案经过五十子局长的解答很明白，想各协议员们没有什么疑义，如有疑问另找机会讨论，现在进行别案。

实际当时伪政府强收的农民土地已达20%，当时全伪满农地1 000万垧，外传2 000万垧，此数不确，至于五十子岚说不过10%，即500万垧乃是欺骗。由于当时确实数字密而不宣，局外人自然无从知晓。日本殖民者当年计划20年移植日本人500

万人，加上原住东北的200万人共为700万人可达到伪满总人口的20%。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流入华北，一部分租种“开拓地”，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农奴，则整个伪满不用象朝鲜那样被吞并为日本领土，形式上保存一个傀儡国家的名义，实质上已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同时700万的日本人可供征兵70万人抵抗苏联，腾出关东军充实侵略中国的兵力。至于当时土地时价：一等地每垧400元，二等地300元，三等地100元，较之所谓“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时涨了十几倍，伪政府每垧仅付以40元、30元、20元的价钞，加上当时伪币膨胀，物价飞腾，三五十元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农民收到百八十元的地价，几十天内就花光了，辗转流离，相继死亡无法估计。

第六日，把所谓“国民动员的完成”项下的议案如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勤劳奉公队，义务劳动，省、市、县协和分会的组织，国防妇人会的组织、邻保（保甲）组织等议案提出讨论，内容复杂繁瑛在此从略。

第七日开会时，三宅说：“应讨论的议案大致完毕，今天请三个分科委员会的责任者把分科会讨论的结果向大会报告。”这时伪安东省、热河省协议员发言说：“预定的议案虽已讨论完毕，但我们想紧急动议把‘讨伐’、‘清乡’问题、栽种鸦片和收购鸦片问题、辅导院、思想矫正场所问题，提到大会讨论一下如何？”

三宅说：“这些问题内容繁多又复杂，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够讨论明白的，并且这些问题不在本会议讨论的范围内，只好另有机会再行研究……。”

三宅把这些危害中国人民最残酷、最凶恶的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和“思想矫正”政策轻轻推却，避而不谈，真是狡猾到了极点。



所谓“分科会”是指按议案的性质内容，由伪议长分别指定伪政府有关方面和地方协议员十几名，利用夜间在协和会馆的小会议室从晚间8时开会，大致由伪政府次长、司长级和协和会中央本部的部局长级，担任临时议长进行讨论。甲论乙驳，乙论甲驳，煞有介事似地闹得乌烟瘴气，伪政府方面也伪装耐心解答，往往相互争持到第二日凌晨一、两点钟，协和会预备高级茶点款待，伪政府方面始终以歪曲的理论和不正确的事例、数字，诡辩坚持；地方协议员多半是些地主富农、农村区长或流氓地痞分子，连一些诡辩的知识也没有。提到数字更是无法证明其真伪虚实，加上连日白天开会夜已过半，疲劳不堪，其中又多有鸦片瘾者，早已涕泪交流支持不住，只好认输，草草完事。日寇却有意利用这些人的固有缺陷，坚持柔斗的态度达到政治欺骗的目的。

分科会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协和会中央本部驱使平日豢养成熟的地方协议员，分别在大会上作报告。大致与伪政府三个次长所解答的没有什么出入，便算通过。三宅又把准备好了的感谢日本关东军电稿提出研究，大家自然赞成。三宅便站起来说：

“八日来的会议在军政各方面指导援助下，在各协议员的热烈讨论下，使九十多件议案顺利完成，实堪庆幸和欣快。已决议案即将付诸实行；未决的议案将由协和会中央本部和政府协商讲求解决的方法。希望协议员诸位，回到地方把会议热烈讨论的情况传给人民，使全国上下彻底知道我们的重大使命之所在，进一步努力增产节约，援助皇军多打胜仗，兴亚大业的实现指日可待……”乌烟瘴气闹了七八天的骗局到此闭幕。

## 政治骗局的罪恶作用

这套骗人的把戏，主要的意义是在开会期间，日本和伪满报纸把每天会议的一切情况和各种照片，用大号铅字大吹大擂占了一二版的整版篇幅，说什么协议员踊跃地畅所欲言，政府官长们诚意耐心的解答，时过夜半还在不倦不怠地讨论、在和蔼热烈诚恳的气氛中进行，这样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哪个国家能如此呢？王道乐土、日满一家的精神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般人谁都知道日本统治者的凶恶厉害，平日是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的。但在协和会里可以随便说话没有拘束，因而有人误认协和会是为人民说话办事的机关，无形中提高了协和会的地位，以达到更便于进行欺骗工作的目的。

在伪政府方面，下决心无论协议员如何吵吵争论，决不能改变其既定的方针政策，不过是利用协和会联合协议会耍弄这种骗局，以便更好地推行其罪恶政策。

在协议员方面，由于多半是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分子，本来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说上几句话，如果有点成效对于他们也是有利无损的。并可在人民群众面前，获得不怕日本人敢说话的虚名，提高身价，增加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进而获得更有利的剥削压迫手段。如果发言无效，对他们本身也无损失，仍然可以勾结贿赂宪兵、警察特务们，在收粮、出工、捐献等方面，上下其手，获得暴利和便宜。

伪军警宪特机关，可以利用会议的机会，对于地方协议员进行威胁利诱，拉拢他们充当走狗，以加强特务情报网。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协议员们认为，能给官家办事，是个巴结不上的好机会，自然乐于被驱使。

## 伪满协和会

古海忠之

贾玉芹 译

### 一、协和“党”与协和“会”

昭和12年(1937年)满洲国开始进入第二个建设时期。欲全面发展国政,尤其是迎来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度,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日本的大力支援,是难以实现的。

这一年的春天,为了交涉有关预算和日本接受满洲国债等任务去东京。事毕返回新京后,凡是遇到我的人都说:“古海!听说这次你要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了?”我完全被惊呆了,立即赶到星野总务长官那里,劈头便问:“你想让我去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吗?”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你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拒绝嘛!”我听后,心想你这是说些什么呀!便回来了,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其后不久,关东军第四课课长片仓衷前来拜访我,张口便说:“古海,拜托了!你就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吧!以前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协和会就是走不上正轨。现在想努力设法将它搞好。目前,能够担任指导部长和甘粕总务部长合作的非你莫属,拜托你了!”我当即回答说:“我坚决拒绝。我对协和会不了解,而且,我一听到协和会的职员们只会说大话,头脑发热,我就生气。关东军说什么除古海之外再也找不到人了,这顶高帽我也不戴,请你再去物色优秀的人才吧!我敬谢了。”我

的语气十分尖刻。

接着，甘粕正彦——协和会总务部长来找我。我象对片仓第四课课长一样，将我的想法和要说的话都坦率地说了出来，而反应却全然不同。他一直默默地听着我说，然后，他对我说：“实际上，我一直物色象你这样既通情达理又不徇私情的人。尤其是我十分欣赏你的人情味。因为协和会缺少的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情味。”由于他推心置腹地同我谈话，反而使我感到为难。但是，我也并未表示接受，只说，让我再考虑一下，便告辞了。而对其他人的劝说，我一概回答以“不”。

又过了两三天，我一贯以师长相待，经常前去请教的田边治通参议约我到 he 家里去，我立即应约前往。他以缓和的语气对我进行如下的一番训示。他说：“古海！听说大家都在请求你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而你却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有做人的规矩。当许多人都说‘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接受这项任务，拜托你了’的时候，应该慨然应允，这就是做人的规矩。你去协和会工作，或许是个损失。然而，不计个人得失，接受大家的委托，这才是为人之道啊。古海！我认为你还是遵守这一为人之道才好！”。

我不能再进行任何申辩，只能称“是”。于是，我才准备接受协和会指导部长的职务。但是，由于在田边同我谈话之前，我的态度一直很强硬，所以关东军的片仓参谋等人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提出还可以兼任主计处长，只希望能担任指导部长。不过，我还是将主计处的工作尽可能地委托给一般会计科长饭泽重一，一心投入了协和会的工作。

就是这样，我同协和会发生了关系。然而，关于协和会的性质和任务，在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而更主要的是，实际上，协和会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有过种种变革，受协和

党创始人关东军石原莞尔思想影响的满洲事变，即满洲建军派的军人和在野人士集团，他们所从事的复古的、道义的活动也在起作用，从而使协和会的性质更加令人费解。就这一意义而言，为了有助于认识协和会，我认为有必要就我参加协和会工作之前的协和会前史作一简单介绍。以下就协和会初期的历史稍加回顾。

协和会是在筹建满洲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的。满洲国成立后，满洲青年联盟盟员、曾参与建党工作，建国时解散的自治指导部干部山口重次，和同人小泽开策共同策划成立满洲协和党。并将草案提交石原莞尔参谋征求意见，石原先生全面赞同，并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这说明关东军同意成立满洲协和党。

山口重次本人深受感动。昭和7年（1932年）4月2日，经石原参谋批准，在奉天确定了满洲协和党的筹备委员，开始着手筹备工作。委员有于静远、阮振铎、和田劲、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等人（他们均为原自治指导部干部）。

山口重次起草的有关协和党的草案，根据石原参谋的意见做了很大修改，修改后的草案包括：1. 党的性质定为一国一党；2. 协和党根据国法做出规定；3. 协和党党费由满洲国支出。

以有关成立协和党的纲领和党章为基础，于4月15日召开政务会议（由国务总理等满洲国首脑和关东军等参加的政务联系协商会议），石原参谋出席，并提出下述要求：

“……我相信将3 000万民众的思想统一到建国精神上来是十分重要的。关东军司令官赞成协和党的成立宗旨；相信创始人的人格，决定成立满洲协和党。满洲国政府也对满洲协和党争以公议，并给以适当的支援，希望该党能在思想上成为建国的基础。我谨代表关东军司令陈述以上。”

关于石原参谋的上述发言，当场并无人提出意见，政府方

面似乎也已同意。然而，由于以执政溥仪为首多数政府要人持反对态度，因此，政府方面迟迟不制定协和宪法。

其后，于6月中旬，资政局撤销不久，在石原先生的斡旋下，经过官吏代表的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琥逸和该部警务司长甘粕正彦同协和党代表山口重次进行对话和交涉，达成了妥协。确定将名称改为“满洲国协和会”，以执政为名誉总裁；以国务总理为首的官吏均为协和会会员。其后，以关东军片仓为中心，改写宣言、纲领和章程，重新确定干部人选。昭和7年（1932年）7月18日，政府将成立协和会的议案提交国务院会议，确定了宣言、纲领和章程。

协和会的干部和职员

名誉总裁： 执政溥仪

名誉顾问：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总务长官驹井德三

会长： 郑孝胥

理事长： 实业部总长（大臣）张燕卿

理事： 参议袁金铠、张景惠等，监察院长于冲汉、立法院长赵欣伯、各部总长：臧式毅（民政）、熙洽（财政）、谢介石（外交）等及各省省长、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琥逸，还有其他若干民间人士

中央事务局： 事务局长谢介石、次长中野琥逸、总务处长于静远、宣传处长阮振锋等

委员会会员： 山口重次、小泽开策、大羽时量、罗福葆、王大忠等，准委员纪井一（课长）、永井亮二（课长）、小川增雄（课长）、小山员治等

从上述协和会的组织和干部的构成情况来看，第一，明确

提出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高级干部都以名誉顾问或名誉理事的身分，成为协和会的有关人员；第二，提出执政溥仪作为名誉总裁；以国务总理郑孝胥为首的全部满洲国最高官吏都是会长、理事长或理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要说明协和会是国家机关，满洲国的全部最高首脑都要对协和会负责么？

乍看起来，它采取了类似政府机关的形式，然而，主张成立协和党的石原参谋等人，认为建国精神工作方面，协和会（党）应对政府进行指导和监督，而在这一方面，官吏是无能为力的。尤其是山口重次等协和党派对于日籍官吏拥有强烈的对抗意识。由此看来，上述做法或许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协和会（党）是正式机关而采取的一种战术，也未可知。

实际上，从负责会务运营的中央事务局，尤其是委员会的人选来看，都是清一色的协和党派。以于静远和阮振铎为首，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都是原自治指导部的干部，特别是其中的日本人几乎都是满洲青年联盟的会员，再联系到石原参谋的存在，不能不会联想到协和党的人事关系及其思想脉络。

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投入工作。

同年8月上旬，在日本陆军的定期调动中，关东军首脑（满洲事变派）几乎全部发生变化。新任关东军司令官为武藤信义大将，参谋长为小矶国昭中将，副参谋长为冈村宁次少将，参谋们也都进行了调动。

小矶国昭参谋长从他担任陆军次官时就反对成立协和党，认为由协和党发展而来的协和会应该解散，更谈不到由关东军司令官任协和会名誉顾问，参谋长任名誉理事了。小矶参谋长试图将日本的右翼团体正义团召至奉天，成立满洲正义团，借以取代并瓦解协和会。但是，他也考虑到协和会的成立经过和

关东军给予的支持和作出的决策，自知无法解散。最后，不仅不允许协和会成为政党，而且也禁止作为政党雏型而存在，确定了同意只是作为教化团体继续保留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通报给总务长官。

在上述情况下，政府与协和会，官吏和会务职员之间出现了某种游离和对立的倾向。为了推动二者之间的合作，于9月上旬，进行了协会中央本部的改组。让协和会的实际领导人、协和党筹建发起人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二人退职；由政府各部的总务司长（即次长）兼任协和会委员会委员；中央事务局次长由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兼任；结城清太郎（满铁高级官吏）任协和会专职职员，负责领导工作；和田劲担任监事工作。这样一来，协和会带上浓厚的官吏色彩，成为类似政府从属机构的组织。

昭和9年12月，自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起，山口重次、和田劲等人即接近板垣，控诉协和会由于官僚化而陷入低潮，并要求恢复原状，同时开始活动，准备推荐曾经是青年联盟干将、现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平岛敏夫出任协和会的领导人。

昭和10年（1935年）春，关东军首脑再次调动，南次郎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为板垣征四郎少将）。同年5月，满洲国政府实行改组，张景惠出任国务总理（郑孝胥退职），总务厅次长为犬达茂雄（阪谷希一退职），各部总长（大臣）大部分也进行了调动。

8月，协和会进行了改组。首先关东军的主要首脑恢复了协和会成立当时的名誉职务，其组织机构也全部恢复原状。

名誉顾问：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名誉理事：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奉



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满军顾问佐佐木到一、关东长官大野绿郎、日本大使馆参事谷正之

会长： 国务总理张景惠  
理事长： 外交部总长张燕卿  
理事： 同初期一样，包括参议、总长（大臣）、总务司长（次长）、省长等所有高级官吏

中央事务局局长： 吕荣寰（民政部总长），次长平岛敏夫  
委员会委员： 结城清太郎（实业部总务司长）、和田劲（专职）、宫胁襄二、星野直树、半田敏治、子山负知、清水良策、高桥康顺、曾维藩、张格罗、罗福东

根据上述情况，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时代，虽然不同于小矶参谋长时代，他理解满洲国建国当时关东军的方针和设想，并决定继续加以贯彻执行。其后，满洲事变派的花谷正中佐和石原莞尔派干将，让正信大尉来到关东军，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在这两名军人的推动下，于昭和11年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表了《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并开展了其它一系列工作。

昭和12年（1937年），在东条英机中将任关东军参谋长，道义的和唯心的方策很难得到关东军的支持，将采取务实的方针。同样，协和会也不能改变以往的做法，于是，协和会进行了改组和人事调动。本部长由于静远担任，总务部长由甘粕正彦担任，我被拉去任指导部长。

## 二、我任指导部长期间

最初筹建的协和党，其一国一党的指导思想，虽然不能肯

定它是唯心主义的，但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维护建国精神（民族协和、民本主义政策）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后来，将“党”改称为“会”的协和会，其性质和内容也都是不明确的。结果，为建设民族协和和王道主义的新国家时，在人以权利为主体的政府机构领导下，很难实现民族协和，因此，便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以达到这一目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昭和7年（1932年），当我来到满洲时，对于协和会毫无了解。而当制定满洲国最初的总预算时，阪谷总务厅长将我找去，命令我在预算中编入拨给协和会的80万日元补助费。我虽然不了解情况，但还是编入了预算。当时，关东军司令部还设在奉天，阪谷总务厅长和我（代理主计处长）带着预算书和附属资料去关东军司令部请求批准。当时，小矶参谋长对我们说：“给协和会的80万日元补助费没有必要，割掉算了！”我由于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阪谷厅长却辩驳道：“绝对不可以”，小矶参谋长同意了原订计划。

小矶参谋长根本就无意执行为建立满洲国而煞费苦心，并实施以本庄司令官为首的板垣、石原、竹下，片仓参谋等人的设想，而且，或许又因为是以陆军次官调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大人物，所以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原本就反对政党政治，认为继承政党政治传统的协和会本身必须解散。并将日本的右翼团体召来满洲，取代协和会，在奉天成立名曰“满洲正义团”的右翼团体。这对于关东军本身和协和会而言，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小矶参谋长调离数年之后，关东军选择一个时机，解散了满洲正义团，将职员和设施全部合并到协和会之中，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昭和7年7月18日，在新京，由国务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协

和会的各项宣言和规章等。其纲领如下：

1. 宗旨：以实践王道为目的，肃清军阀专政的余毒。

2. 经济政策：振兴农政，改革产业，从而保障国民生活，清除共产主义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垄断。

3. 国民思想：重礼教、乐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亲善，满洲国协和会章程（仅选其中若干条款），如：

第四条：本会以振兴满洲国之建国精神和宣扬王道政治为目的。

第五条：本会会员需是满洲国居民，并符合已定的会员规则（分普通会员、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三种）。

第三十三条：本会经费由会费、国库补助费和事业收益及其他杂项收入解决之。

从上述纲领来看，其中罗列了类似政府的方针、政策之类的事项，而第四条却又规定该会员以振兴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和宣扬王道政治为目的，说明它似乎完全是一个从事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的组织。还有，虽说是全国性的组织，但是，作为其基础的会员实体和构成又不明确，而且，又没有维持该组织的资金基础，因此，协和会的具体工作很难开展。结果，必然产生抽象空谈，甚至吹牛的风气。同时，石原参谋关于“协和会在建国精神问题方面，必需经常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监督和指导”的指示，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因而协和会职员对于官吏经常持对立的态度。

协和会成立当时实际领导人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两人，其后来也不得不退职，由阪谷总务厅长和结城清太郎二人负责领导工作，后来又恳请平岛敏夫任协和会总务部长等（这时部分办事机构也有变化）。尽管进行多方的探讨和努力，但都未收到明显效果，究其原因，不外是由于协和会的性质不明确和组织

的涣散所造成的。

昭和11年（1936年）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同时还撰写了与声明有关的小册子，散发给有关方面，其主要内容如下：

协和会的定义是，“协和会是充分领会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实现其理想的唯一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体”。在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规定“协和会既非政府从属机关，又非对立机关，乃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政府是在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的基础上组成的机构……当真正的协和会员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以建国精神完成国民总动员时，则王道政治可望实现。”

上述声明和小册子，是由石原莞尔将军的信徒、石原派干将辻正信大尉执笔的，其根本思想就是以石原参谋为中心筹建的协和党的思想。由于找不出直接这样规定的理由和根据，所以才说成“协和会是政府的精神母体”。在为了使关东军司令官的上述声明合法化而写出的小册子中，或许是为了提高关东军司令官的威信，做了极为牵强附会而又不敬不逊的表述：“满洲国的政治乃哲人政治。关东军司令官即哲人，即天皇之代表”。

这份声明的事非姑且不说，小册子的上述内容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日籍官吏的首脑大达茂雄总务厅长向关东军提出了严重抗议，寸步不让。他说：“把关东军司令官说成是哲人，其意义虽然令人费解，然而，更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时候被指定为天皇的代表，如果任意自称是天皇的代表，这就是非同小可的严重问题了。”于是，关东军乱了阵脚，关东军首脑多次跑到厅长这里来，力图辩解，而厅长就是充耳不闻，断然拒绝，最后竟宣布辞职。另一方面，关东军在问题发生后，拼命地将发

出的小册子收回销毁。

12月，由于大达茂雄总务厅长的辞职使风波得到平息。我们对于大达厅长绝对不向关东军妥协、据理力争的精神，深感敬佩。

军官民各界在大和旅馆，为大达茂雄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他在会上所作的告别讲话也令人难以忘怀。至此，关东军的首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而我至今回忆起来，仍不能不为大达茂雄的堂堂男子汉精神所感动。

在植田司令官发表《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同时，以花谷参谋和比参谋等人为中心，动员全体协和会成员，大规模地扩大协和会组织和发展会员。个别发展的方式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某些城市，尤其以新京特别市为中心，遍访市内所有的町会，进行讲解和动员，将町会指定为协和会的分会，町长即为分会长，使分会遍及全市。通过这一工作，协和会会员号称达200万人。

协和会尽管被说成是同志组织，又说只有掌握建国精神者才有成为协和会员的资格，企图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在精神和道义方面具有高水平的组织，然而，欲实现这一目的却十分困难。在协和会难以获得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无意义，那就是它暗示了协和会的性质（国民组织）和协和会运动的发展前景。我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被拉入协和会工作的。

当我到协和会工作时，其机构已经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名誉总裁为皇帝溥仪，名誉顾问为关东军司令官，会长为国务总理，这一些都依然如旧。关于理事长和理事的情况，如今我毫无记忆，至于理事会更不必说，一次也未召开过。

中央事务局也被撤销，设中央本部作为协和会的执行机关，

在本部长的领导下设总务部长、指导部长和监察部长，采取部、课的组织形式。本部长为于静远（后来桥本虎之助取代），总务部长甘粕正彦，指导部长古海忠之，监察部长和田劲。此外，协和会的决策机关为中央本部委员会，选任年轻的大臣为委员，各部部长均兼任委员，关东军第4课课长片仓也是委员，每周召开1次委员会，审议重要会务。

我每天都到协和会本部去，详细了解其组织情况，职员的工作和思想。在同干部的谈话中，发现原协和会系统的职员和新职员，对于协和会的认识竟然如此不同，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他们对于政府官吏怀有对抗意识。在这一意识中，来自石原思想对协和会的认识仍然存在，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对此可能有所助长。甘粕和我都认为，以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为目标的官吏和会务职员，二者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必须迅速结束其间的对立状态。经过同政府磋商，制定了二者可以对等的立场和相互自由调动的制度。首先，为了加强协和会组织的薄弱环节宣传科，将这一方面的权威，总务厅参事官武藤信男调任协和会宣传科科长。同时，协和会的财务机构也不健全，经费用途不清，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又从政府调来会计专家任财务科科长，以整顿协和会的会计工作。

当时，协和会的原有的有关人员和职员，绝大部分都认为“协和会是同志组织”。同时，在有关人员和职员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这种同志集团，他们自以为是协和会的指导力量，甚至存在排斥其它成员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些同志意识，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这种势力根深蒂固，工作十分棘手。至于我个人，不仅不是同志，甚至被认为是反对派的同伙。

于是，我曾对他们说：“你们说协和会是同志组织，那么究

竟是以什么为目的的同志呢？如果说凡是领会满洲国建国的根本精神的人就是同志，那么，你们这种歧视他人的同志观岂不可笑？所谓同志，到底由谁来认定？如果以私人关系论定又当别论，如果是合法的协和会的同志，就必须有一个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决定组织。口里高喊同志、同志，而干的却是破坏协和会组织的统一，导致分裂和对抗的局面，这种活动必须停止。”我说完之后，一个个表情尴尬，一言不发。据了解，所谓的同志，就是旧时为组建协和党而出力的一伙人的集团，以石原莞尔参谋为中心，以其思想为行动准则的一派。我认为，必须统一各种观点，明确协和会的本质和组织，从而积极开展协和会运动，并且坚定了为此而努力工作的决心。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于昭和12年（1937年）8月，修订了有关会员规则和分会组织的旧章程，并予以公布。

过去，协和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三种。各种会员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而经过修订的会员规则则定为“凡志愿实现本会目的、年满20岁以上，身心健康的满洲帝国人民均可以入会”。此外，还制定了有关会员的行动和管理的各项规定，以及关于分会组织的规则；确定了分会组织按地区划分的原则，以居住在一定地区的会员成立组织，不承认以往以集中行业组织和各阶层的政治要求为目的的分会组织。同时，在规则的第一条（分会）中规定：凡机关、公司的办事处、工厂、矿山，或与之相类似的工作单位均可视为一个地区，可以成立分会。

总之，通过上述修订，排除特殊性，站在国民平等的立场上，力求使协和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的国民组织。

昭和13年（1938年）7月，根据国内外形势要求，在同协和会组织有机联系的基础上，根据民族一体的协和义勇奉公精

神，为了实行警备、动员，以及训练和组织，以各民族年满20至35岁的青壮年男子组成协和义勇奉公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上至大臣下至佣人，不分阶级，全国着用的那著名的协和会服，以及具有礼装性质的绶带，都是根据甘粕总务部长的提议和设计制定的。此外，堂堂的协和会馆落成，机关报《协和会志》也终于出版，这个时期协和会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协和会经费主要由满洲国政府负担，由于我担任指导部长的同时，还兼任主计处长，保证了必要的预算，使协和会得以发展。

协和会的有关人员和职员，通过同分会会员及其它方面的接触，不仅在精神工作方面，在经济、民主、福利等方面，从国家到地方，都站在民众一边，同政府间进行协调和联系，使协和会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协和会的联合协议会。这时，协议会也逐步的健全起来。即联合协议会共分县（旗、市、地区）、省（首都）、全国三级。县、旗市协议员由分会代表和县本部委员等选任。省协议员由县协议员和省本部委员中选任。全国联合协议会则由在全国范围内从首（首都）协议员、中央本部委员、省协议员选出，及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处理委员中选出的委员组成。逐步召开各种委员会、座谈会和正式会议。对于提出的议案逐一进行协商和反复讨论，最后由正式会议作出决议。决议不实行多数同意制，而是采用众议统裁（由主席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裁决的方法）。

在全国联合协议会的中央委员、参与和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处理委员中，包括政府各方面的负责人和特殊会社的负责人。在全国联合协议会审查议案时，作出决议的事项必须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当然，联合协议会同议会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它决不是立法机关。但是，它了解国民的愿望，可以在政府和国民之间进行疏通和协调，有时还议论政策的当否，甚至使之改变。由此可见，全国联合协议会制度具有独特的政治优越性。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下，而又不可能不考虑民族问题的满洲国，以联合协议会一类的制度为基调谋求发展，确实是一副对症的良药。

基于上述原因，政府同关东军磋商，满洲国确立了如下方针：过去因违法乱纪立法院院长赵欣伯被弹劾免职的同时，撤销立法院，只保留立法院事务局。现在将该局撤销，由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代替立法院发挥作用。

昭和11年（1936年）12月，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大达茂雄总务厅长辞职，财政部次长（翌年改称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被特任为总务厅长。翌年2月，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长调离，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中将继任参谋长。同年9月，石原莞尔少将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是满洲国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关东军参谋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曾活跃一时。因此，他的到来给某些人带来一种希望，石原派开始蠢蠢欲动。

### 三、协和会与石原莞尔

在石原到任前夕，东条关东军参谋长将甘粕正彦找去。并说：“现在决定由石原莞尔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他是满洲国的创始人，在当地一般来说也有威望，朋友也多。这些情况我也知道，所以我愿意与他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是个怪人。所以，有时难免同我发生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能立即起来为我们调解，使我们更好地合作共事，拜托你了。这件事只有你甘粕能胜任，除你之外再没有别人。”

甘粕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件事，并说：“看来东条也很介意

啊！”

然而，在这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周旋，就是甘粕也无能为力。实际上，陆军就没有合得来的可能。石原是思想家，尽人皆知地尖酸刻薄，公开地将东条参谋长叫做“东条伍长”，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他的身边还有象当年板垣参谋那样拥有超群的实践能力的好搭档，又当别论，现在这样的好朋友已不复存在。因此，石原往昔的盛名和威信也逐渐走下坡路，在东条的为人和实力的抑制下，差不多是气息奄奄了。

昭和13年（1938年）2月，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取代于静远兼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长。7月，甘粕总务部长作为满洲使节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出访意大利，是对曾访问满洲国的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的回访。而且，使节团在访问意大利之后还将为了增进友好和发展经济关系，访问已承认满洲国的德国和西班牙等，此次出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担任留守任务的我，除总务部长之外，还兼任新京特别市支部的事务长和女子国防妇人会的专务理事。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全心全意地为促进协和会工作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开始传出一股流言说，将免去古海的指导部长，派山口重次担任。由于关东军、政府和协和会的负责人都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我也没有特别介意。但是，又传出了排斥我的言论。

祸根就是石原副参谋长。在新京召开的全国在乡军人的大会上，石原副参谋长做了演讲，当涉及协和会问题时，他竟在公众面前大放厥辞。他说：“现在的协和会实在不象样子，这都是因为让象古海之流去搞的结果。那种人只要不尽快罢免赶走，协和会就绝对不会好。”

不久，出席这次集会的人们接二连三地前来向我报告这件

事。对于这种在公开场合所做的侮辱性发言，我绝对不能容忍，我立即开始行动。

于是，我立即去关东军第四课，我说，既然关东军最高首脑之一在公开场合说出了那番话，我想我不久要辞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而且也不可能作为官吏再继续工作，所以我要辞去总务厅主计处长的职务，回日本去，希望能给我一个明确的处理。

片仓课长等人说，石原这个人就是那么尖酸刻薄，希望你不要生气，等一等再说。桥本本部长说，这不仅仅是你的问题，也涉及到我本人，请将这件事交给我，你再等一下。这样一来，我只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了。

涉及到我自身的协和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这期间发现关东军内部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而协和会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就是，石原副参谋长提出了一个包括关东军、政府和协和会在内的满州政案，关东军不得不加以解决。据说该方案内容有10条以上，内容属机密，我们当然无从得知，后来了解到大致包括下列事项：

1. 在将关东州转让给满洲国，将南满洲铁道会社改为满洲法人的同时，在东京设一协议机关，以公正合理地决定有关日、满间的国防和经济问题。

2. 关东军为了尽快撤回对满洲国政治的干预，缩小第四课，3年之内予以撤销。

3. 管理满洲国军的军政部由皇帝直属。

4. 排除日本垄断资本家在满洲国产业经济界的垄断活动。

5. 为了排除使满洲国变成日本殖民地和少数日籍官吏的专政，设立以协和会为中心的国策决定机构和企划机构。首先，在协和会会长领导下，组织中央委员，作为国策决定机构的母

体。与此相关联，应使古海之类的官僚辞去指导部长的职务，由协和会（党）的创始人山口重次领导协和会（摘自山口重次著《满洲建国的历史》）。

上述石原副参谋长的改革方案，如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

石原副参谋长的这一改革方案，在企图实现的过程中，遇事便同关东军首脑们意见相左，军内得不到统一。最后，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首脑们不得不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是否采取改革方案。经过认真的讨论，石原改革方案被全面否定。当然，有关我个人的去留以及协和会的问题，也就决定保持现状，没有变更的必要。

其后不久，于昭和13年末，石原竟从容不迫地搬家回东京去了。身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军官，竟如此自由行动，是涉及军纪的严重问题。为了给他的行动找出理由，使之合法化，据说有关人员曾煞费苦心，狼狈万分。

这件事姑且不论。协和会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做为主要问题之一，既然提出了我担任指导部长是否合适，我认为我还是以辞去指导部长为好。同时，我一贯主张协和会虽然从事思想工作、精神工作，但必须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实践。而协和会只是限于道义、精神等抽象的空谈，不进行科学的探讨。一方面倡导民族协和，却又无视构成其基础的各民族的民族性。我认为在协和会内也设立调查企划部是绝对必要的，于是我便向桥本本部长建议，并获得批准，新设企划局。我辞去指导部长，任企划局副局长（局长为本部长）。与此不相前后，甘粕也辞去了总务部长。

而关东军内仍有人认为，满洲国创始人之一，又是协和会创始者的石原莞尔将军，由于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而离开满洲，

而对立面的古海却仍然悠然自得地盘踞在协和会中，未免不妥。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关东军同星野总务长官和协和会桥本本部长商量，动员我辞去协和会的职务出国访问。这也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我做为协和会的代表出席于昭和14年（1939年）9月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然后面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纳粹党进行调查研究。这对于从来未去过外国的我，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同年4月，我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欧洲航线轮船“桦名丸”前往伦敦。协和会总务科长阪田修一被选定与我同行，为我提供了一切方便。

## 伪满洲国协和会

阿拉塔 关朝格珠 舍旺

伪满时，在兴安省各旗县设有旗县协和会本部，在各行政区和努图克设置分会，由区长和努图克达任分会长。每个分会专职书记一二名，分会由村长、艾里达等组成。各本部都给会员发会员证，以证明你是某分会的会员，规定应遵守哪些章程，每月交纳多少会费等。会员主要协助协和会完成各项任务，如向上汇报农村情况、社会动态，尤其注意“流言蜚语”。

日本侵略者说协和会是满洲国政府的“精神母体”，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国家团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附属机关，更不是与国家政府对立的机关。说协和会以实现“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为理想、是实现天皇圣意、与满洲国政府“表里一体”的组织。

协和会从中央到地方分会每年召开一次联合协议会。其内

容即协和会工作行动纲领中的第四项“宣德达情”。通过这种会议大肆宣扬满洲帝国的德政方针，并通过协商研究，了解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以提案形式层层报请上一级联议会研究接受解决问题，实质上是“宣德达情”的实施形式。1945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故做镇静，以求安抚民心，前后召开了中央和地方两次联合协议会议。

第一次是1945年5月，兴安总省协和会本部，召开了全省联合协议会议。会议由总省本部长博彦满都主持。各旗、县、市长和参事官（日本人）以及各族各界的会员代表近30人参加。

总省协和会本部长博彦满都致开幕词，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讲了话（阿拉塔任翻译）。这次大会，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为其所谓“支援圣战”所召开的一次动员大会。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提出了保证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三十多条提案，但日本人仅以“……战争年代，困难是有的，我们日本人也在克服困难，只要更多地支援‘圣战’，打倒美、英，才能很快地提高老百姓的目前生活……”为借口，敷衍塞责地作了答复。

第二次是1945年7月25日，在新京（长春）协和会馆召开了全国各省、市、旗、县协和会官员和代表参加的全国联合协议会议。这次大会共开了4天。会议由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兼满洲国协和会会长张景惠主持，兴安总省本部长博彦满都、本部次官白滨晴澄出席了会议，阿拉塔以联络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协和会名誉会长山田乙三、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以及宫内府大臣等也参加了会议。伪满洲国皇帝兼协和会名誉总裁溥仪到会接见了与会代表。

满洲协和会会长张景惠和日本关东军一名中将在会上讲了

话。内容与兴安总省联合协议会的讲话大致相同。会议期间，各省代表提出一百多条提案。其中部份提案，在会上由伪满兴安合作社总社理事长和全国专卖总署总署长做了解答。对粮食、棉布、食盐、火柴、油类等日用品的要求，全以所谓“战争时期，克服困难……”为由回答了事。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 协和会在甘南的组织与活动

姬洪声

1932年7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满洲国协和会”，在各省设事务局，各县设办事处。但当时并未全面普及，没做到每县都设办事处。甘南县在1935年（伪康德2年）仅设一个“联络员”。迨至1936年（伪康德3年）3月才正式建立“协和会甘南县办事处”，当初地址设在甘南县城南大街路东（今甘南一中的对过）。

1936年7月25日协和会实行改组，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本部”。甘南从1938年（伪康德5年）11月正式建立为“大满洲帝国协和会甘南县本部”，本部的最高职官称事务长，由日本人儿岛勇任事务长。办公地址迁移至大十字街东街路南，新建日本式水泥瓦房两栋（今为甘南旅社）。在全县发展建立9个分会（甘南、集贤、长山、中兴、兴隆、宝山、平阳、东阳、前大岗子），后发展为11个分会。

协和会的纲领、基本任务是：

一、建国精神之发扬；

- 二、民族协和之实现；
- 三、国民生活之向上；
- 四、宣德达情之彻底；
- 五、国民动员之完成。

由此可见协和会的机构性质乃是一个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它的使命是参与政治决策，组织动员，保证政府政策法令实施而进行宣传教化，实际上是在关东军的指使下，从不同角度维持日本侵略者利益，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自1934年（伪康德元年）以后，协和会的工作主要还从事反共活动，因此它又是个反动的政治组织。

1941年（伪康德8年）4月，协和会与伪政府实行了所谓“二位一体制”，各级协和会组织最高职官即由同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兼任。这实质是对协和会的权力与地位的加强，以期充分利用发挥协和会的组织力量与作用。从那时起，县里协和会本部长即由县长担任。

1941年4月至10月，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郭英麟。

1941年10月至1943年7月，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孙金城。

1943年7月以后至东北解放，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张士选，副本部长为江口义雄（日本副县长）。

协和会为扩大它的宣传阵地，还组织发展、吸收了许多外国组织、社会团体为它工作。

从1938年（伪康德5年）协和会在各省、市、县中小学中普遍建立起“协和青年团”、“协和少年团”。县里在协和会内部设“青少年团统监部”，由协和会本部长兼统监部长。在各学校举行授团旗仪式。甘南、宝山、平阳、东阳各小学都授有团旗。



开始把奴化教育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妄图借此训练培养新一代忠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

甘南道德会：讲仁义道德、信仰天命，提倡顺时听天，“忍为高和为贵”，大受协和会的喜欢，一开始就成为协和会的赞助团体，大加发扬。

1938年11月成立了“国防妇人会”，首任头头由伪县长林士魁的老婆、日本参事官新井清的老婆担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成立了“军人后援会”、“防空协会”等。此外还有“工商公会”。其它宗教团体，都必须依附协和会。

1939年，又成立了“勤劳俸仕队”，县设大队、村设中队，队长的人选都由协和会推荐或委派。

协和会自成立以来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伪政权垮台，在甘南地方搞了许多运动：

(一) 征募“国防献金”，由协和会国防妇人会发动，实际上是由各村屯按户摊派，每年每户最低伪国币5元。群众有民谣曰：“国防献金、国防献金，逼命坑人；左一茬，右一茬，聘裤当袄也得拿”。临灭亡之前还发动“烟粟鼠献纳”——挖“大眼贼”（一种草原鼠）、“金属献纳”、“血粉献纳”。

(二) 农业增产出荷运动。即所谓粮谷出荷，全县及各村催粮谷，协和会都是主要成员，参加宣传训示与实地催搜。

(三) 兴亚运动。主要宣扬“打倒英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作东亚霸主。

(四) 储金奖励运动。主要鼓噪储金报国、支援大东亚圣战。名目有“通帐储金”、“必胜储金”、“国防储金”、“特别储金”（购买商品或到饭店吃饭时，在商品销售价格中按比例加收储金券）。此外还有种目繁多的其它储金等等。

(五) 勤劳俸仕运动。主要搞无偿义务劳动。农民、市民、

学生、职员都规定有一定日数的劳动日，进行国防等工程施工劳动。学生修飞机场、擦炮弹、军粮包装、修路。从1943年（伪康德10年）凡征集国兵不合格青年都编为“勤劳俸仕队（着装），每年集中6个月，边军事训练边劳动。我县主要去查哈阳水利工地挖河渠。

这些运动都由协和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主办或协办。直接为“大东亚战争”搜掠人力、物力，补偿它们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

协和会的会员，在1937年（伪康德4年）以前，是实行所谓的严选主义的，一般人会为会员者，是要有点资格、身份的或对日占领满洲有某些功绩者。当时的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会员、赞助会员三种，会员人数不多。甘南县不完全统计是36名。1937年以后，实行了会员大众化，规定条件是相当松泛的。据敌档有关资料：“凡为达成本会目的迈进之满20岁以上，身心健全之满洲帝国人民得为本会会员，虽非满洲帝国人民，而准予前项者亦得为本会会员”。由此可见，凡满20岁以上身体无严重疾病、精神正常的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可成为协和会之会员。会员人数从此剧增，甘南县到1945年（伪康德12年）以前的会员人数达3772人。入会会员发给一枚蓝色的“会徽”和铝制门牌（约3公分宽10公分长），上写“大满洲帝国协和会会员”字样，嵌在门框上。

（摘自《甘南文史资料》）

## 我所知道的辽中县 伪“满洲帝国协和会”

王翔峰

我于1940年至1945年，被雇用担任“协和会”辽中县本部嘱托。“嘱托”是日本名词，近似于顾问之类的职务。于此期间，我曾先后参加过村（街）、县、市、省各级联合协议会。

### 各级联合协议会与县公署之间的磨擦、矛盾

各级联合协议会与县公署之间，由于争权夺利，经常发生磨擦。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就有好几起。比如：

1. 辽中县朱家房区联合协议会议长窦赓扬，曾任过数届县联合协议会议长。他多次在协议会开会时，对该区警察署署长包笑天提出指责，言词十分激烈。由于言之有据，使包笑天有口难辩，只能在心中暗暗叫苦，因此便怀恨在心。与此同时，窦赓扬也顶撞过县里的一些科、局长。长而久之，他便树敌过多，自己在同僚中越来越孤立。在1944年的县联合协议会开会结束那天夜里，他突然被包笑天派人抓了起来，挨了一顿捆绑毒打，并说他犯了“反满抗日”罪，送交到奉天市（沈阳）警察局。两个月后，终以“查无实据”被释放。从此，就更加深了县协和会本部与县公署之间的矛盾。

2. 协和会与县政府之间，不仅满系人同满系人有矛盾，日系人同日系人也有矛盾。1944年，日本部分在乡军人和在“满洲”的部分资本家，在县“协和会”事务长福田千义的支持下，

谋划在辽中成立“辽中开发株式会社”。事情已到开办前夕，遭到了县公署的恶视与阻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协和会省本部不得不把事务长福田千义调到台安县去，同时又把凌源县的总务科长中村健调到辽中县来接替福田千义的职务。因为当时的县长蔡景襄是从凌源转来的，他与中村私人关系密切。

上述两项矛盾的处理结果，都是以协和会一方被迫失势而告终。

### 协和会的附属机构

1. 青少年统监部——青少年科。青少年统监部附设于协和会县本部内，由部员和部员补主持工作。统监、副统监则由本部长（县长）、事务长兼任。在中、小学普遍建立“协和”青少年团组织。县统监部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各学校检阅。

2. 国防妇人会。以“县长”、“副县长”的“夫人”任正、副会长，以职员家属、女职员及女教师为会员。在县本部设女书记一人。每逢庆典或开大会时，她们佩“职带”出席；在战时担任募捐、送慰问袋等工作。

3. 军人后援会。该会附设在县本部内，有主事一人，工作人员一人（兼翻译）。其工作职责是专门收集会费。对热心“献纳”会费的人，根据他们出钱多少而分别授予“普通”、“优秀”、“特优”等“荣誉”称号，并发给金属证章以资鼓励。随着“献纳”人员的减少，会费的金額也在不断下降，到后来就有点没人“献纳”了，于是只好按照工商业资本的多少和农民土地拥有量的多少硬性摊派。收上来的钱就上交“协和会”县本部。就在辽中县本部收钱最多的1941年，这个本部的办公室，在一天夜间发生了火灾，烧毁了全部文书、档案，钱也没有了。同时在临街的墙上，发现了“焚毁媚外禽兽的巢穴”、“八路军

散在各地即将举事”、“中美英苏共伐日本”、“日本快完了”等标语。

事后，伪警宪便以辽中县协和会县本部的全体职员为怀疑对象，经过再三审讯，但毫无效果。后来发现军人后援会的收款员柳春阁失踪，便把另一名收款员宋春琪拘捕审讯，直到发现柳春阁已投河自杀，才算稀里糊涂了案。究竟这一案子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未查清楚。

4. 青年训练所，在协和会市、县本部统治下，普遍设置青年训练所，以各该市、县协和会本部长为所长，事务长为副所长，又以主任教导为主要负责人。其编制大致如下：

主任教导：负责拟定各期训练计划，并负贯彻、执行责任，同时担任讲授《国民常识》课。

辅导员：辅佐主任教导进行训练，并负责讲授《建国精神》课。

教导：负责发放或保管“建国杖”（器械体操用具，即木棒）。

军事教官：由军管区派现役军人中的中、少尉担任此职，负责军事教育，计有步兵操典、射击规范、阵中勤务等科目。其训练目的，起初是为“国兵”培训候补兵员，后来，就转为培训“青少年团”骨干、协和会分会职员、“勤劳伟壮队”队长等。1944年与奉天（沈阳）造兵所订立训练合同，由该所出经费，并派技术人员担任技术课，结业后全部去奉天（沈阳）造兵所当徒工。后因劳作过重、伙食低劣，大部分请假或逃回。

青年工作宣传队，该队任务是配合“讨伐队”赴外地进行宣传。“讨伐队”由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为领导，打着协和会的旗号，带着慰问品、宣传品，跟着“讨伐队”去“宣德达情”……

（摘自《辽中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 回忆伪满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

李哲伟

1937年1月18日，伪满民政部、军政部、蒙政部共同发布了《青年训练规定》。按照这个规定，青年训练由协和会负责进行。各级协和会都设青年训练机构，1941年后，伪满中央设青年训练部，省设青少年科、县成立青年训练所。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于1940年成立，地址在协和会院内，当年开始训练，训练对象是在国民中挑选有文化、身体健康的16岁至19岁男青年。其目的是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妄图把青少年拖入青少年团，又到自卫团，再到军警的道路上，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1943年7月到10月第7期协和青年训练所实况如下：

### 一、网罗青年

1943年8月20日，吉祥村（今吉祥乡）振兴屯（今振兴乡振兴村）公所赵小跑来到我家说：“庆庚，到屯公所去一趟，上边来人找你有事。”我心里格登一下子，不知啥大祸临头。到屯公所一看，除了屯长曾宪武以外，还有几个穿协和服戴眼镜的生人。屯长对那人说：“就是他。”戴眼镜的人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说：“行，这小子长的棒实，叫他去！”屯长还皮笑肉不笑地叫我准备行李，上鹤立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受训3个月。我一听到协和会，脑袋嗡地一下子天转地转眼发黑。那时民间多怕遇到官事。流传有“日本军、宪兵队、特务机关、协和会”，是伪满四大硬机关头，一听就毛骨悚然，弄到那里去，不死也扒

层皮。第二天一早到屯公所集合，本屯青年同去的还有夏明德、尚士环、刘宝珍和我4个人，都一个个愁眉苦脸心情不好，此行不知到那遭什么洋罪。

第二天坐着屯公所派的花轱辘官车上路。那时，从振兴屯到鹤立街（今鹤立镇）得绕到松花江边施家亮子（今德祥村）曲折38公里，太阳卡山前才赶到鹤立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院里有一个大个子翻译（卢伯勋）正同一个日本人哩啦哇啦向一个伪军上尉示意什么，我们也听不懂，赶忙把行李放在宿舍，然后报名登记，又到西门里医院检查身体，回到训练所换上前几期已用过的旧黄色服装，西瓜皮式战斗帽、后开门黑色夹胶鞋，每人发1支老掉牙的“七九”式（套桶子）步枪，1根2厘米粗1米长的小柞木棍（日本起名曰建国杖），一整套准军事的东洋打扮。

青年训练所受训科目主要分政治、军事两项，附以勤劳奉公活动。

## 二、准军事生活

准军事生活，每天早晨5时起床，由助教李有山带队正步走出大门，跑步到街外阿凌达河边或北门里建国神社广场，跑动1圈返回，还得正步进入训练所大门。洗漱后方能吃早饭。1天3顿高粱米饭、土豆酱，宿舍屋中摆上一排大条桌，开饭前各人按固定坐位腰板挺直地坐下，口笛一响，领头的喊一声“伊达达稽公司”，大伙也得随着复颂一遍才能吃饭。饭盆端上你争我抢，狼吞虎咽，饭里砂子多，合不上牙，顿顿吃不饱。再一齐翻一句“伊达达稽么夕达”，方能散食。夜间指派不寝番（值宿）每班两人，两小时一换班，负责看护枪支，安全守卫。记得有一天夜里得知厨房柜里有头目吃剩的狗肉，不寝番者班班

偷吃狗肉，一夜间把狗肉吃光。次日梁辅导气得破口大骂，把十几个不寝番叫到一起，用建国杖往头上痛击，边打边审问：“看你他妈嘴还馋不”，“满洲人就是奴隶性，不打不行”，个个脑袋都打得肿了大包。

### 三、奴化教育

每天上午由训练所教导主任卢伯勋（鹤立协和会本部部员，长春建国大学生出身）讲政治课，中心内容是协和运动，包括协和会的诞生、宗旨等。卢伯勋常引用本庄繁对协和会的解释，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协和会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它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也不是与政府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精神母体者，即建国精神也”，而“建国精神”则被植田解释为“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圣德”。这就是说协和会首先是向广大中国群众灌输所谓“建国精神”的反动的政治思想。鹤立县协和会本部长由日本人副县长河口登兼任，偶尔到课堂进行时事演讲，鼓吹大东亚圣战战况，什么“皇军马尼拉登陆”、“德意志在苏联三千里战线攻击”，以及“民族协和”、“万邦协和”、“协和精神”等欺骗宣传来奴化青年。鼓动青年为大东亚圣战奉公。每天中午12时还得就地立正为“玉碎”阵亡皇军默悼1分钟，灌输武士道精神。训练生都在表面上佯作默悼，常常是假作低头，斜眼环视，暗里发笑。

### 四、军事训练

按照伪国兵训练模式，列队正步走出训练所大门，扛着破套桶子枪，这枪弹仓楞高，还硬叫模拟“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一跑一颠达，梭子骨卡得红肿疼痛，在往返鹤立街行进中



唱《陆军歌》，用日语唱《爱马进军歌》。军训场地常在东门外阿凌达河套，北门外砂坑，北门里建国神社广场，西北山根等野外，多在广场学列队式，野甸子里学攻击战。由一个现役伪军上尉杨××充当军事教官，退役伪军梁××为辅导员，李有山为助教。半天一晌地在草塘里滚爬，伏击冲杀。杨教官是河北省乐亭人，他在公开场面按科目训练，见日本大龟准尉也敬举手军礼；背着日本人却常在野外发牢骚、议论泄愤：“我他妈的才不学日语呢”，“现在战局吃紧”，“到时候都得长点心眼儿”，“不管到哪个朝代都得有点本领好”。不清不明的话语一讲就是个把钟头。有一天在野外他教唱“怒发冲冠……”旧时歌。天天弄一身泥土，做完军事科目到河边洗脸排队回归。不但白天训练，夜间也时常演习。在9月18日，日伪为纪念入侵中国的一天，训练所搞一次夜间演习，当夜晚10点钟，忽听电铃叮叮咚咚急响，梁辅导员大声疾呼：“快起来，有紧急敌情！”这一突如其来举动可把大伙吓懵了，以为抗联打进鹤立街。又不准开灯，东一头西一头又摸裤子又划拉枪，跑到当院集合。教官查出有穿反鞋的，有把裤子前后穿倒的，一群狼狈洋相，免不了挨一顿屁股。

## 五、古怪茶会

日本人的茶话会近似中国的座谈会。在9月的一天，协和会谍策全体训练生加入协和青年团为团员。头目把大伙领进会议室，桌上放两堆柿子，几碗茶水，两盘青梅糖球，正面挂红地黑风火轮协和青年团旗。先由协和会头目（日本人）训词，卢伯勋翻译。大意是“日满协和如弟兄，协和青年团要发扬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万邦协和”等骗人鬼话。从1938年6月15日，协和会发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把青年全部统一在协和青年

团和协和少年团之中，并置于协和会控制之下，宣传协和青年团员要为大东亚圣战而奉公。

## 六、欢送伪军

从1940年4月11日起，伪满洲国公布并实行《国兵法》，从此伪满军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凡年满19岁男性青年，合格者服役三年，不合格的均编入勤劳奉公队（群众称国兵漏）义务劳动。1943年秋鹤立县应征入伍伪军百余人到协和会集中欢送。在头一天协和会从鹤立街弄来20来名青年姑娘，夜晚住在训练所大宿舍北炕，把训练生都哄到南炕挤。大伙都合衣挤着休息，要出外解手回屋就没地方，折腾一夜却都没睡好觉。训练生第二天列队在协和会院内集合欢送。那些青年妇女手托小红花，逐个给新伪军佩戴。洋戏匣子（留声机）里伴唱《爱马进军歌》和《大东亚决战》等日本歌曲。之后，从军官身后出来一名20上下岁女青年，身穿仁丹士林市长衫，浪罢流丢地向伪军抿嘴一笑，行一鞠躬礼，唱起“我这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怕相思偏偏又把相思害……”这首《卖相思》流行歌曲。当时我看到一些伪军心情不安，满脸愁容地低头苦思。事后得知，唱歌的女青年是北市场妓院歌妓。

## 七、日本部落割稻

有一天，站好队头目讲：“今儿个外出不拿枪，协和青年嘛，要义务奉公，日满协和要与大日本一德一心，亲邦皇军上前线，我们在后方帮他们家秋收。”快步出北门到日本人一个部落寡妇户割水稻。一大片肥沃良田，因为男人都当兵去了，所以部落里多是妇女和老弱残疾。她们没力何弄好庄稼，稻田荒芜，半天割出半垧地，临返前日本老妇点头致谢：“阿力嘎斗勾杂一吗

司”（谢谢），看那老妇还怪可怜的。事后听说她一家男人都在前线“玉碎”（阵亡），扔下寡妇一人无依靠，可见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害者。

## 八、“攻击”吉祥

“攻击”吉祥，是第七期军事训练的一次战斗演习，出发前，教官训示：“三个月的训练要毕业了，今天发给每人三发空包子弹（教练弹），假设敌人是‘胡子’（指抗联），攻击地点是高街东边十八里吉祥村。”又说“兵在神速，行军要快、冲锋要猛、定要凯旋归！”一声出发命令一气跑步9公里，到吉祥北门外就地散开，分三路从北门攻入，杨教官举起指挥刀喊：“哈牙哭（快）冲锋啊！”奴才洋相的日满协和话都用出来了。杀声四起。正在干活的村民都被这一急促枪声吓得四处奔跑，攻进村里不知是谁竟把枪口对准拴在木桩上的老黄牛肚子，把它打得哞哞怪叫，刹那间把一个平静的村庄搅得鸡飞狗跳墙。攻到村公所后，教官宣告攻击胜利，在村公所东面小广场列队，唱军歌走出北门，村民多以鄙视的眼光看他们的鬼洋相。

## 九、火车站装白菜

10月下旬，北风萧萧，初寒袭人。训练生列队后，梁辅导员说：“今天要勤劳奉公，支援大东亚圣战。”他一翘尾巴就知道拉几个粪蛋，什么奉公圣战，准又叫大伙给日本人效苦力。果然不出所料，到鹤立火车站一看，有几万斤冻白菜急待外运。现场还有十来个日本军看管，翻译说天冷了，白菜往佳木斯日本军大营装运，这是协和青年勤劳奉公之举。日军端着亮刺刀，头戴钢盔，在四周看护监视。梁辅导员嘀咕着日满协和话，还奴颜卑膝地掏出伪军证给日军献媚。我们一个个手冻得拔凉才装毕，

列队唱军歌回营。

## 十、永发游动

10月末刚下过一场2寸厚的雪，训练生还穿着单衣鞋，个个冻得哆哆嗦嗦，举着协和青年团旗，去鹤立街西永发村游动，照例列队进入永发村小学校操场，转游两周，唱几个军歌、稍息、返回。这次游动头目没有训话，可能只作了一次耀武扬威（日本人惯用此伎俩），一路冷冷清清，返回训练所，个个象没长毛、秋打损鸡似地哆哆打战。

伪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自1940年成立开始训练第一期后，每年训练两期、每期50名训练3个月，共训7期350人，这些人集训结束后，再没有集中活动过，其中除极少数人当了伪军、自卫团（棒子队）外，农村去的青年都回家务农，“协和精神”全扔到脑后，盼望祖国早日光复，不当亡国奴。

（摘自《汤原文史资料》第六辑）

## 伪满范家屯协和会的青年训练

滕先林

日伪时期，人们把“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协和会”称之为“四大硬”。协和会所干的勾当，是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主要对象是青少年，灌输“建国精神”、“实现建国理想”。为了向青年进行奴化训练和教育，特意组织了“青年训练团”。所参加青年训练的人，都是范家屯街各商号的学徒工。协和会把指标拨给各商号，商号老板就叫

适龄的青年店员去参加训练。至于你个人愿不愿意，那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我就是这样硬逼着去受训练的。

1943年，全范家屯街各商号16至20岁的青年店员达200来人，都按时集中到协和会，接受这种非人道的奴化训练。当时青年训练团的团长由协和会的书记袁明述兼任，他是个恶霸地主，外号叫“袁大麻子”。副团长是郜桐。教官是杨俊德，为人凶恶狠毒，外号叫“杨大马棒”。范家屯协和会分会的主事是日本人，叫西泽正三郎，还有个翻译叫詹名扬，他俩亲自坐镇策划监督。当时，被编成一个大队，两个中队，四个小队。大队长先是鲍富国，后是张国良，他俩都是范家屯泰来烧锅的店员。因为泰来家财大势大，少东家还是留日的学生，经理范传九又是商会会长，真是“主多大奴多大”，他俩就“荣任”了大队长，尤其是张国良，有一身“效忠”日本天皇的“本领”，对上溜须拍马，对下吹胡子瞪眼，深受日本人的青睐。一中队长杨照忠是义德兴的店员，二中队长韩达三是韩家床子的，两个人会喊一口流利的日语口令。

青年训练团不光是为的训练，因为当时是1943年，也就是日本倒台子（1945年）的前两年。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渐处劣势，关内日本侵略军连连失利，日本人感到前景不妙，就把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四个小队各有特殊任务：

一小队为行动队，主要为协和会所搞各种活动服务。小队长叫杜春。

二小队为自卫队，主要是为警察署服务，也就是为警察当“帮凶”。小队长叫王恩沛。

三小队为消防队，为街公所服务。小队长叫周沧海。

四小队为护路队，为火车站警护队服务。小队长叫程文秀。

到训练的时候，都集中训练，不训练就分别到各自服务部门去“服务”。从各小队所担负的任务来看，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凡是参加青年训练的，每人发给一套黄色的训练服，一个战斗帽，一付腿绑。发的服装只许训练时穿，平时还不许穿。每个人在上衣左兜盖上带一个“八紘一字”的胸章，长5公分，宽2公分，红地，中间有蓝色的象葵花形状的图案。在胸章上还绣有阶级标志，正团长绣上两道黄杠，副团长是一道黄杠，大队长是两道白杠，中队长是两道黑杠，小队长是一道杠。每个人发给一根木棒，长1.2米，直径3公分，美其名曰“建国杖”。在训练时顶枪使用。训练的时间，开始是每周三、六的上午，后又增加为周一、周三、周六上午。训练的科目：立正、稍息、队形变换、战斗训练、建国体操、建国杖操，以后又增加了“铁锹操”，一个人拿一把大铁锹下操。有时发给木制枪，学刺杀，还有防空训练和消防训练。每天训练一开始，面向东南遥拜“日本天皇”，得行三个90度礼，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劲，又改为3分钟的“持枪礼”。这3分钟得象钉到地上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接着就是背“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背完之后，西泽正三郎、詹明扬、袁明述等人训话，大讲“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和“武士道精神”，天天如是地讲，你都得立正注目地听，稍一走神，就会被叫出来，问你：“我说什么啦？”要是回答不上来，上去就是一顿“嘴巴”，再不就是罚跪，另外还得让你用日本话背“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背不下来就是一顿暴打。每逢他们训话的时候，不管心里怎么咒恨，表面上得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在背“国民训”的时候，不会也得装会，随大伙背。有一次新来的一个队员，他不会用日语背“国民训”，硬叫他背，背不对就打。把他气得背地里说：“日本话不用学，再呆二年用不着。”没成想竟然叫人告发了。杨

大马棒先是一顿毒打，接着就要以“反满抗日”论罪。商店老板急忙托人送礼才算拉倒。这个小伙子刚来东北谋生，不几天又被人辞退回关里家了。

每逢一到训练日，大伙的心都砰砰直跳，简直象过“鬼门关”一样。日本人西泽正三郎在旁边进行监督。这个狠毒的日本人，会说几句日本式的中国话。大个子，因为有个罗锅总猫着腰，走起路来脖子一伸一伸的，他总想把腰板拔直了，显示“尚武精神”，可就是拔不起来。教官杨俊德，60岁左右，高个子，近视眼，一脸横肉，留着日本式的“八字胡”，说话有点秃舌头。因为日本话没学通，又想赶“时髦”，就把中日两种话混到一起说，大家叫它“协和语”。他下的口令，一会是日语口令，一会又是中国话口令，有时一个口令里一半日语一半中国话，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杨教官教练的本事并不高明，打骂人的本领却高人一筹。他“发明”一种“协和嘴巴”，在训练时，看谁因为没听懂他的口令，把动作做错了，立即找出两个人，让对面站着，一人一下轮换着打嘴巴，不使劲杨大马棒不让，结果你使劲打我，我就使劲打你，两人越打火劲越大，直打到鼻口流血，杨大马棒在一旁哈哈大笑。有一次“和兴厚”商店派来一个刚从山东来的年轻人，“冷丁”地听不懂杨大马棒的“协和语”口令，只好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学着做，这样一来动作就慢了一点，杨大马棒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暴打。杨大马棒这些人挖空心思遭践人，有时他怕打人累痛，就叫你拔正步，老半天才下一个口令，实际上就是罚你单腿站，这种损招真够人受的，没拔了几步就顺脑袋流汗，两条腿生啜啜。

受训练的青年除了被他们打骂以外，还得被他们“勒大脖子”。1944年春，黄瓜刚上市的时候，杨大马棒拿两角钱叫我给他去买1斤黄瓜。我当时也没明白他的意图，再说，我也没有钱

给他垫上，只买1根黄瓜拿回来啦。这一下子可惹来祸了，杨大马棒上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接着就是几脚，还罚了1个小时的跪。当时我被打得懵头转向，不知道为啥挨打，事后才蹙过腔来，不由得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恨骂：“这些不长人心的豺狼，不能得好死。”

除了训练之外，还得进行“勤劳奉仕”、修国道、挖河渠。每逢防空日，就拿着“建国杖”到街头站岗放哨。一到冬天，就到粮栈给维持秩序。有的队员被警察署找去，帮着警察去堵截“经济犯”。在这些活动中，个别人由于品质恶劣，“帮虎吃食”，干些欺压和打骂百姓的事。因此，老百姓给编了个顺口溜：“青年团协和会，人家拿枪他拿棍，吹胡子瞪眼唬一阵。”

因为这些受训的人员，都是各商号的学徒工，是所谓“义役训练”，参加训练期间，仍然由商号开工资。白天训练一结束，就急忙回商店，拼命地干活，好把训练时耽误的活补上，不然的话，就有被裁掉的危险。这真是去训练时惊心，回来时担心，从来没有安心的时候。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个自顾不暇，顾不得管青年训练了，我们才解脱了这种苦难的“奴化训练”。

国民党来了之后，袁明述、杨俊德俩人，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的“建军”头子，继续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解放后，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一辑）